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三年六月

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

王鴻泰*

明中期以來，有經世之心的士人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下，展開談兵論劍的活動，本文嘗試由社會史、心態史與文化（知識）史三個層面對此進行討論。首先，考察這些活動是在何種時代氛圍與社會情境下進行？其社會性質與文化意義如何？其次，進入士人的生活世界，探究其習武心態，思考他們在談兵活動中到底懷抱著怎樣的現實意圖、情感寄託與人生想像？再次，由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探測士人習武的知識趣味何在，討論他們將兵學武術放在怎樣的知識脈絡下？開展出哪些表現形式？而此類知識（或技藝）又被如何看待？

關鍵詞：談兵論劍 武功 武學 武藝 武俠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 (93-2411-H-260-005-) 補助，謹誌謝忱。又蒙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一併致謝。

前言

明中期以來，王朝面臨各種軍事危機，而且此種危機越演越烈，先是「北虜南倭」，接著是「東奴西賊」，從蒙古犯邊、倭寇擾境，到滿州入侵，流寇四竄，外患內憂，交相逼迫，王朝危機，波及鄉里。然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生活的繁華，也日益豐富多采。而處身其間的士人，一方面目睹家邦之危，一方面又追慕城市繁華，同時，個人又往往歷經科舉挫折。就是在此種種國家危機、社會繁華與個人挫折的複雜情勢、情境下，處身其間的士大夫、縉紳、一般士人，相率投入兵法與武術的講求活動，而有所謂「談兵論劍」的風尚。[1] 這種談兵論劍的活動相隨於明王朝軍事危機的擴大而越來越盛行，以至於成為一種具有擴散性的社會活動，由官紳階層向外擴及其他不同階層，因而形成特別的社會活動與社會文化，以致成為晚明的重要文化特色，也成為文人文化中的一環。

這種武力的追求或談論是一種獨具特色的社會活動。本來，武力的追求就是一種組織性活動，在實踐上往往由官紳出面號召、教練、組織群眾建立武力以自衛。但明後期兵法武術的講求，卻不止於此，它也常常成為社交活動的開展機緣，甚至，談兵論劍本身就是一種社交活動，這個活動的展開讓士大夫階層、縉紳、一般士人，以至於各種奇才異能之士，甚或各色雜閒人等、招搖撞騙者，也都在追求武力的名目下，或純粹的兵劍談論活動中，被收納進入其中，因而形成一種奇特的異類交游活動。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背景下，這種以武會友的交游活動更與士人的社交活動相結合，而繁盛、豪誇地演出。

再者，習武風尚也可能發展成為獨特的社會文化。原本習武風尚是出於現實性的需求，但在晚明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尤其是士人獨特的現實處境與特殊的心態下，它卻不只是在現實層面上，求保鄉衛國之實效而已；它也提供了一種特別的人生想像，許多士人，尤其是歷經科考挫折，或不甘心人生受困於科舉者，更

[1] 關於晚明士人談兵風氣之興盛，可參見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二章〈談兵〉，頁 79-142。趙氏文中有言：「本章所處理的材料，包括有關『談』這一行為的記錄，與所談之『兵』。」故其所論重點在明代士大夫之憂時談兵行為及其有關兵制之言論。趙氏此作與本文有相互發明之處，然則，本文所論乃置於文人文化之脈絡下，著重一般士人之談兵心態及由此衍生之社會文化。

賦予武學一種非現實性的意義，武學成了士人不凡人生追求的憑藉或展現，因而，這也成為他們有別於科考的另類知識追求與技藝展現，從而進行別開生面的知識或技藝活動。另一方面，武術更與士人的「任俠」心態相結合，由此發展出一套別具意趣的武俠文化。可見，此習武風尚乃涉及心態史、知識史與社會文化史等面向，也因此本文的討論包含這些不同面向的思考。

時代的氛圍如何影響知識分子的心態取向、知識活動，乃至觸動社會文化的發展，這是本文的思考要點。本文嘗試透過士人習武活動的開展，探究其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活動，分析其社會意義，並進而觀察它如何形成別具特色的社會文化。

在實際討論上，本文嘗試追究：明中後期以來，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下，有心士人如何展開談兵論劍的活動？這些活動在何種時代氛圍與社會情境下進行？其社會性質與文化意義如何？社會層面的討論外，本文更嘗試進入士人的生活世界，探究其習武心態，思考他們在談兵活動中到底懷抱著怎樣的現實意圖、情感寄託與人生想像？再者，除著眼於士人之心態外，本文也試由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探測士人習武的知識趣味何在，討論他們將兵學武術放在怎樣的知識脈絡下？開展出哪些表現形式？而此類知識（或技藝）又被如何看待？要之，本文之討論，大致包含社會史、心態史與文化（知識）史三個層面，然此三者往往相互糾結，難以截然分割，因此在實際討論過程中，乃依議題與行文之推展，而穿梭其間。

概略而言，晚明士人之談兵論劍有「實學」與「游藝」兩個面向，本文前兩節「武功」、「武學」部分討論其「實學」面向，後兩節「武藝」、「武俠」則探究其游藝面向。當然，這是一種策略性與觀念性的區分，分梳之目的乃在理解其內涵之複雜，藉以觀測習武風尚所意涵之知識趣味的多重屬性且相互摻雜，我們不可過於執著，認為這是界限分明的知識範疇，否則難免刻舟求劍。事實上，本文的目的不在清楚地定位明代武學的固定屬性，而是在探究明代士人習武活動的複雜心態與知識意涵的流動趨向。再者，本文偏屬於社會文化之外在面向的討論，主要探究士人習武風尚的形成及其表現方式，暫不深究兵學、武術之實際內容或文化生產，也不涉入有關武俠文藝作品的討論。

一・武功的追求

大體而言，明王朝經太祖、成祖兩朝的積極用兵之後，進入仁宣時已大抵解

除武裝，進入文治的階段。這個和平時期到英宗時，由於事出偶然的土木堡之變，而出現緊張情勢，這個偶發性的事變之後，帝國內部仍大致維持著和平的景象。至成化年間，社會矛盾漸趨明顯，局部地區已開始出現動亂，雖國家武力尚足應付，不致釀成大患，不過，敏感的士人已然聞及兵戎氣息，而有欲試之心。到了弘治、正德年間，蒙古的不斷入侵，更成為帝國的憂患，有心官員或士人，已經明確感受到這種危機，因而開始有習武之心，甚至有藉武建功之意。這種習武心態大抵屬於傳統「經世」理念的伸展，在此經世理念下講求兵法、武術，乃將武力置於現實層面來考量、追求，這可說是習武的基本機能與意涵，不過，這種武學的基本意涵，也相隨明王朝軍事情勢的緊張而有別具異趣的發展。以下，且在現實層面，相隨明王朝的時代危機的變化，對習武風潮的發展，尤其是相關社會活動的開展過程，進行考察，並由此思考「武學」意義的演變。

（一）尚武時代的來臨與武功的典範

追溯明代尚武風氣的開啟，可以上溯及突破明初以來程朱獨尊局面的王學開山祖師陽明身上——湛若水在〈陽明先生墓誌銘〉中總結陽明一生志趣與學術的發展歷程道：

> 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2]

而據陽明年譜所載，陽明在十歲出頭時，即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對以登第，他卻不以為然，可見他是個極度自命不凡的士人。而這種不凡表現為任俠行為，則是：

> （憲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
>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幾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3]

---

[2] 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401。

[3]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三二，〈年譜一〉，頁 1227。

由此敘述可見陽明早年之溺於「任俠之習」，乃與其「狂」的精神意態相表裏，而其具體表現，則在於對軍事上的留意關心與企圖參與，這種關心與企圖，可謂乃對社會動亂之有感而發，而落實在行為上，則在於武術的精通，與胡人較量騎射，這成為他任俠行徑的具體表現。由湛若水指稱其「溺于騎射之習」可以想見，少年陽明對此種個人武術的追求應該極為沈迷，而這種沈溺可以說是以武術為自我實踐之道，「騎射」對此一階段的陽明而言，正如其往後之致力於「聖賢之學」一般，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志業」。

王陽明在年齡更長後，相隨於明王朝的國防危機，更持續其對軍事事務的關心，只是思考上已經超越個人武術的層次——年譜中又載：

> （孝宗弘治）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
>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是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惶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4]

顯然陽明浸淫於武術十幾年後，相隨於朝廷軍事情勢的緊張，他更進一步的反省，漸覺個人之武力不足恃，因此，更進而學習兵法。這樣一種學習歷程，加上陽明後來的仕途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機緣，讓他的武學知能走向實踐之途，也由此建立不世之功。如此，王陽明的武學，由任俠心態出發的個人武術訓練，發展成軍事上的兵法演練，最後，終於在政治場域中，獲得發展機會，而成為軍事家。陽明武學知識技能的發展，是由個人行徑走向政治作為，這個過程或許可說是個「順理成章」的過程，也就是說他的武術修練，也正如傳統士人的學優而仕一般，最後被歸納在正統的「經國濟民」之途中。這種發展讓他的「任俠」心態沒有逸出於正統的士人價值範疇，他沒有走上「俠游」之途，成為「另類價值」的創造活動，也因此，他的任俠尚武並不在「文人文化」的範疇中，他的武術到了一定的階段之後，就和「經世」之途銜接，而未與文人式的「浪漫」情懷繼續交纏合成，因而也沒有成為文人的自我實踐憑藉。

王士禎《池北偶談》中有言：「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5] 誠然，王陽明之一生於道德、學術、武功上皆有極卓越之成就，即以軍事而言，他的經歷亦非常人所能遇。固然，王陽明的武學發展在相當

---

[4] 吳光等，《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卷三二，〈年譜一〉，頁 1229。

[5]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九，〈談獻五・王文成〉，頁 201。

程度上有其個人性與特殊性，他的能力、機會與最後的成就，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沈德符有言：「弘治以文治天下，縉紳無以武事見知者。……惟王文成以理學建安攘，遂開國封，固書生之希遘矣。」[6]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陽明的尚武除了個人的好奇與敏感外，也可說是普遍的時代問題的反映。《四友齋叢說》中嘗引張南園之言道：「華容劉東山為兵書時，極意薦才。時張綵為稽勳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北虜火篩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余素知綵姦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7] 可以想見弘治、正德之際，也就是在陽明因「邊報甚急」而「留情武事」的同時，兵學大概也已經成為一種熱門的知識，以致有人藉此以求「越次之舉」。是可知，陽明之講究兵學，實有現實情勢為其背景，而在此情勢下，談兵應亦已成一時之風尚。

約當陽明寓北京聞邊報學兵法之時，北京城的最高領導人明武宗也在此時代氛圍下，以更「偏激」的方式「留情武事」。明武宗的好武，雖然不像王陽明，終於名正言順地由此建立不世之功，而以荒唐收場，但其好武卻也可以，甚至更足以，視為時代精神的反映——《明史》〈武宗本紀〉起始即載道：

>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諱厚照。……性聰穎，好騎射。十八年五月，孝宗崩。壬寅，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戊申，小王子犯宣府，總兵官張俊敗績。[8]

顯然，朱厚照之「好騎射」已被史家視為最重要的性格表現。而這種性格除可說是天性使然外，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時代氛圍所致，蓋其即位之初即有蒙古小王子犯宣府之事，在此刺激下，其意欲在武功上有所表現，亦可謂乃人情之常。就此而言，可以說武宗的好武，實與陽明之因邊報急而學兵法，有共同根源，都受時勢的牽動。只是，武宗之「好騎射」卻與其身分地位不相稱，因此年方十五，而即位方半載的少年皇帝很快地受到糾正——《明武宗實錄》中嘗載：正德元年六月，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上奏言道：

> 近因災變疊見，伏蒙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伏覩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延日

---

[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一七，〈兵部・邊材〉，頁429。

[7]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九，〈史五〉，頁81。

[8] 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一六，〈武宗〉，頁199。

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伏望陛下惕然省悟，……屏去玩戲，放逐鷹犬。[9]

由此描述，可以更清楚地看見明武宗也深具「任俠」性格，因而在此任俠性向中，對武學極感興趣，以致於在宮廷之中，練習騎射，操練弓矢甲冑。而這些行為在持重的大臣看來，俱屬輕浮不經的「游戲」，非帝王所宜。這次的糾正行動，並非僅止於大學士，李東陽等人首倡其義之後，禮部尚書張昇、工科給事中陶諧、監察御史王渙等人也都陸續建言，而這一波波的建言中，皇帝的「好騎射」都是主要的糾正項目。這次的諍言，即位未久的皇帝，在口頭上表示接受，但事實上，武宗對武功的追求，始終未曾或忘，而更變本加厲以行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辰，微服如昌平。……丙寅，夜微服出德勝門，如居庸關。辛未，出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毋出京朝官。九月……壬辰，如陽和，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庚子，輸帑銀一百萬兩於宣府。冬十月癸卯，駐蹕順聖川。甲辰，小王子犯陽和，掠應州。丁未，親督諸軍禦之，戰五日。辛亥，寇引去，駐蹕大同。十一月丁亥，召楊廷和復入閣。戊子，還至宣府。十二月癸亥，群臣赴行在請還宮，不得出關而還。閏月丁亥，迎春於宣府。[10]

蒙古小王子的再三侵犯，自即位之初，就已成武宗揮之不去的困擾，武宗之好騎射，固然多有逸樂之成分，但此種外患困擾，應該也是重要的刺激與動因。不難想像，這個外患的確實存在，一方面可能更激發他的好武之心，另一方面，也讓他的好武，有了具體的對象、目標，其「好騎射」因此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成為通往成就武功事業的路徑。也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文臣官僚在即位之初的強烈規勸，終究無法發揮攔阻作用，其好武之心，愈益發展，以至於「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甚而，演成微服出關，挺身前線，直接與敵人交鋒，且駐留前線不歸。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王陽明與明武宗的好武都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反映。

---

[9]《明武宗實錄》（收入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一四，「元年六月庚午」條，頁 429-431。

[10]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六，〈武宗〉，頁 209。

這兩人，一君一臣，後來為了擒拿寧王，竟乃演出「爭功」之事，此種爭求「武功」之事，除了充滿戲劇性外，也極具象徵意義。從某個角度來看，陽明與武宗可說是「同類」。這兩個人都是特別「聰穎」，因而時代感受特別強烈的人，而且這兩人都有極強的意志力與行動力，得以將其時代感受，直接轉成行動。因此，當他們處身於政治中心——北京——得以接觸、感受到時代之動盪時，其尚武精神乃相應愈發展，此尚武精神發展至極致時，以至於皇帝本身竟意欲以軍人自許，甚而與下屬爭取平亂之機。要之，陽明與武宗，都是在動盪時代中，激發尚武精神，只是一者得到機會，得以將此精神落實於「經世」大道中，實踐成功。另一人，則受限於身分，其尚武精神無從著落於正當場域，終於使此精神動力，以游戲的方式呈現，乃至被當時，以及後代之評論者，視為荒唐行徑。且勿論此中之幸與不幸，此種尚武精神，殆可視為明代中期之時代特色。

（二）談兵風氣的延續與擴散

王陽明與明武宗可以說是明中期尚武文化的表徵性人物，由此肇其端，明王朝尚武之風，相隨於軍事危機的日趨嚴重而愈益興盛，顧璘有謂：

> 弘治丙辰間，朝廷上下無事，文治蔚興。……逮今上（武宗）御極以來，羣盜並起，嚮用武力，學者恥言文事。[11]

顧璘自弘治九年考中進士，開始入仕，歷官弘、正兩朝，其所謂弘治尚文，而正德以來「嚮用武力」，應是出於切身感受。只是其所謂「用武」導致「恥文」，則未必盡然，或屬過激之辭。事實上，明中期以來，論文與講武往往相互激發。不過，正德、嘉靖以來，尚武成風，文人亦好談武事，則是明顯事實。蓋在「嚮用武力」之時勢下，善於展現軍事才能者往往獲得重用，汪道昆在〈送劉大夫按察貴州序〉中有言：

> 頃匈奴數入邊，又島夷竊發，東南騷動，四方不無事矣。於是簡異能之士置職方，且有所用之也。……然而薦紳大夫好倜儻之畫策，往往以言兵顯，此亦豪士之資也。[12]

顯然，國家危機也是知兵者的轉機，朝廷為應付軍事危機，破格任用軍事人才，

---

[11] 顧璘，《顧華玉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1263 冊），卷一，〈息園存稿文・關西紀行詩序〉，頁 458。

[12] 汪道昆著，胡益民等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一，〈送劉大夫按察貴州序〉，頁 8-9。

在此激勵下，士大夫多有以武建功之意，談兵風氣也因而日趨於盛——《萬曆野獲編》中有言：

> 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荊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詞林，足為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真二大參，俱真正邊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則沈少林狀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賫志以沒。唯二十年來，如顧沖庵養謙、葉龍潭夢熊、萬邱澤世德、李霖寰化龍、梅衡湘國楨，皆因四方多事，各從簪筆吮毫，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俱正位司馬，延世金吾，頓令措大吐氣。若穆宗朝楊虞坡、譚二華、王鑑川、劉帶川輩，又未易指數。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郎撫，其人素講學，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為部卒譁亂，備極窘辱，既而逃入襄陽，尋冒功事發，詔徵入獄，則真尿汁諸葛亮也。[13]

弘治、正德時期，明王朝主要的軍事危機來自北方的蒙古，至嘉靖時，情勢未見稍緩，反因倭寇問題的嚴重化，而有所謂「北虜南倭」的威脅，明王朝南北交迫下，軍事問題更形嚴重。唐順之、趙貞吉等人即是在此情勢下「究心武事」。至萬曆時，東北滿州問題也漸浮現，成為另一外患，因此談兵之勢越演越烈。由沈德符此處觀察可見，陽明之後，士大夫之談兵者，實不乏其人，其所以如此，殆可謂乃時勢所至，不得不然耳。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包括在朝廷中位居要津，儒學素養高深，且以文學知名的學者，也就是說當時社會上最為菁英的知識分子，也都「究心武事」，這顯見兵學已經在最核心的知識圈中成為熱門的知識。就此可謂，兵學在明代中期已經成為一時之顯學，而文武兼修，已是部分士人的自我要求與期許。此外，前引沈德符所述也顯示：王陽明的文成武就，也為士人樹立一個新的典範，他首建奇功後，已經成為時代英雄，往後之知識分子，多有追慕、仿效者。[14] 事實上，以王陽明自許者，亦不止此處所指之郎撫一人而已。[15]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自命不凡，學識廣博，喜好講兵舞劍，而其

---

[13]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文士論兵〉，頁 435-436。

[14]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四，〈經四〉，頁 32，文中嘗言：「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效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

[15]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三，〈朱白泉獄中上百朱二公書〉，頁 67-68，載：「朱白泉觀察原名友桂，……觀察雖入貲為郎，性甚剛毅，勇往敢為。屢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白泉與余最善，憶戊午歲冬夜，與白泉及謝蘅泉侍御小集綠筠堂，挑燈剪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涔然淚下。白泉以王文成自

〈論虛談大道不講寔務之病〉一文中嘗言：「轉思漢武之功大矣哉，後儒苦以黷武譏之，安得不腐。昭代于忠肅、王文成，洵二人哉！大公無我，明道適用，旋元視履，知人善任。」[16] 言下之意，對陽明武功上的成就，極度推崇。據此或許也可說方以智的講兵舞劍，極可能心中也多有陽明身影的牽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嘉靖時談兵名列第一的唐順之。他是當時最具聲望的讀書人，學識之淵博，為一時之冠，他著有《武編》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介紹道：「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概以書生之見目之矣。」[17] 蓋順之因倭變而致力於兵學之研究，其後乃參與剿倭軍務，雖初戰不利，但終而見功。唐順之的兵學涵蓋兵法與武術兩個層次，兩者皆足以為名家師。其《武編》中嘗論列諸家武技，而戚繼光《紀效新書》中討論兵器之使用時嘗稱：「巡撫荊川唐公子西興江樓自持槍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槍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荊翁曰：『人身側行只有七八寸，槍圈但弩開他槍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弩即大彼槍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曰：『如此，圈其工何如？』荊翁曰：『工夫十年矣！』一藝之精其難如此。」[18] 而王世貞序《握機經》時有言：「崑山明齋王氏與念菴羅公、荊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以其說盡授之魯川曹君，曹君向與戚大將軍商之，戚深以為然，數數向予稱道之。」[19] 唐順之的武技與兵法最後也確實能付諸實踐，且實踐有功。他後來被任命為淮揚巡撫，參與了剿倭軍務，在此實務中頗見功績。四庫編臣有謂：「其應詔起為淮揚巡撫剿倭也，負其宿望，虛憍恃氣，一戰而幾為寇困。賴胡宗憲料其必敗，伏兵豫救得免，殆為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部署既定，亦頗能轉戰蹙賊，捍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

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眾怨，自攖其罪。」由此亦略可見，陽明在入清之後，威名不減，猶然不乏追慕者。

[16] 方以智，《浮山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13 冊，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影印），卷五，〈前編・論虛談大道不講寔務之病〉，頁 553。

[17] 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影印），第 3 冊，卷九九，〈子部・兵家類・武編〉，頁 160-161。

[18] 戚繼光著，盛冬鈴點校，《紀效新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一〇，〈長兵短用說篇第十〉，頁 116。

[19]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卷一〇〇，〈子部・兵家類存目・握機經〉，頁 163。

琯、劉秩迂謬僨轅者可比。」[20] 唐順之亦如陽明，因憂心時局，而留情武事，且終而學以致用。然則，陽明之習武，可謂「先知先覺」，而順之之質兼文武，博學及於兵法武技，則可謂乃時勢所至，順勢而為。此下，明代士人之談兵論劍，已蔚然成風矣！

明代尚武的風氣漸興於弘治、正德之際，往後隨著王朝軍事情勢的日益緊張而瀰漫擴散，嘉靖時期有所謂「南倭北虜」的威脅，除了北方的邊患外，敵人縱橫於東南沿海，乃至深入最為富庶的江南地區，直接威脅鄉里社會，因此談兵風氣乃更普遍流行於社會之中。萬曆以降，王朝危機加甚，「東奴西賊」——東北的滿州及西北的流寇——更危及王朝命脈，在此時勢下，軍事知識之需求乃更迫切。錢謙益曾為瞿星卿所撰之《兵略》一書作序，其中言道：

>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於世，……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有譜，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旰食乎？[21]

由此序言可見，這部兵法的編寫及優先出版，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因應時勢與現實而有此。然則，此處所謂「人不知兵」之說，與其認為兵事少人關心，毋寧理解為這是談兵者眾，以致不乏濫竽其中者，故而刻意強調其中實有真知與冒濫之別。這是由於軍事知識已成流行知識之後，關於這種知識的爭論也隨之而起，同時，也出現關於此種知識的鑑別活動，或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參與此種知識活動者。關於此，錢謙益另有文敘道：

> 當東事之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於長安，余笑曰：「未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懌而去。……無幾何，甫以兵死。[22]

在此可以看到兵學已經成為社會上的熱門知識，因而有心於此的士人乃積極求此，以至在經過鑑定，而未能獲得肯定之後，更設法求取相關資源。申甫之所以切切於此，愈挫愈力，可說乃是社會上談兵風氣已盛，事此者多，以至更有意欲出人頭地者。

---

[20]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卷九九，〈子部・兵家類・武編〉，頁 161。

[21]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收入錢曾箋註，錢仲聯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二九，〈兵略序〉，頁 873。

[22]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八，〈蕭伯玉起信論解序〉，頁 865-866。

瞿伯略與申甫之所以以兵學求教於錢謙益並非個別或偶然之舉，錢謙益是明朝後期最重要的士大夫與文人，位居顯要且為文壇領袖，活動範圍涵蓋政治與文藝，交往圈極為廣濶，甚而，他本身就是一個社交中心。而在其社交活動中，談兵活動斯屬其中之要項，其生活周遭實多有談兵者聚集。他在〈謝象三五十壽序〉中敘道：

> 君初為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犂庭掃穴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劍，登壇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哉？[23]

前引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所載，嘉靖以來，已多有儒臣在時勢之刺激下，涉及武事，「兼文武才」，乃至意欲藉武經世，以武功顯名，此種風氣至天啟年間乃有擴大之趨勢。由此敘述略可窺見當時士人談兵氣概之一斑，蓋此時談兵已成「自負才略」而意欲有為之士大夫抒發抱負的具體表現，這一方面是現實的關心與講究，另一面也是意氣的表徵與激盪。同時，這是時代的機會與需求，這些參與談兵者，多有學以致用的機會，或者，在社會需要下，負有經世之責的士大夫，亦不得不究心於此。然則，參與談兵者，實不止於士大夫階層。錢謙益另在〈吳金吾小傳〉中有言：

> 天啓元二，東事方殷。搢紳韎韋，雲集闕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詞垣則徐子先、顧九疇，卿寺則董見龍、劉夢胥、何天玉，臺諫則游肩生，部郎則王季木、曹元甫，貴介則顧所建、茅止生、劉晉仲、翁孝先，布衣則孟羽尼、張任甫、金大初、胡敬仲，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購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逝將繩度黑山，弓彎綠水。期生少年金吾子，飛揚徵逐，家世將壇，諳曉表餌方略，矢口奮臂，獵獵然風生燄發，何其壯哉！迄今四十年所，星移物改，疇昔高談闊步，請纓說劍之流，皆已化爲碧玉，漫爲土堆。[24]

由此描述可以看見談兵風潮已形成一個別具特色的社交圈，而參與這個談兵活動圈的人已經不限於士大夫階層，天啟年間，在滿州問題的刺激下，北京的談兵活動甚為熱絡，而此談兵活動集結了不同階層的士人，自內閣學士以至於布衣，乃

---

[23]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六，〈謝象三五十壽序〉，頁 1018。

[24]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收入錢曾，《錢牧齋全集》），卷三七，〈吳金吾小傳〉，頁 1279。

至並非儒生背景者也參與其間，因而演成一個活躍的社交活動。錢謙益這篇文章寫於明亡之後，文中頗見感傷情懷，而在此感傷之中又透露出對往昔盛況之追懷嚮往。錢氏之筆調中，國家的軍事危機，彷彿又成就了一番繁華盛景，而此盛況乃展現於熱鬧的談兵活動中，或者說是由於談兵活動而熱烈展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中期以來的國防危機，提供了一個大的歷史背景與機緣，由此造就了談兵論劍的氛圍，而在此種氛圍下，談兵乃成為一種重要的社交名目，由此展開繁盛的社交活動。前述瞿伯略、申甫之與錢謙益相論兵學，應該就是因為錢謙益本已對此活動多所參與，且（被認為）深悉其中竅門，以致被視為兵學評鑑家。

滿州對明王朝的威脅引發另一波談兵熱潮，這波談兵熱事實上並不侷限於首都，南京亦不遑多讓——錢謙益另有謂：「海內方多故，奇才劍客，歙集舊京。」[25] 此可謂乃以兩京為中心的時代潮流，風行之下，廣闊地將不同階層的人捲入其中，關於這種風起雲湧的談兵潮，我們不妨再參照另一位當事人的觀察。前述錢謙益所羅列之談兵者中，最有成就的應該是「貴介」茅元儀，而參與此談兵活動的茅元儀，對此談兵熱潮有別具隻眼之觀察與評議：

> 當東奴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為恥，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其人亦非素所習者，或標竊三式，或祖述條陳，或妄說陣圖，或詭言幻術，或力能挽強，技能舞劒，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己與之交，又竊其餘聞，以侈譚於朝廷之上，其不能者即降心推之，驟獵美官而去，故士大夫有不知其無當，而深信以為可行；或明知無當，而止欲借此以自便，故其人得官得賂，侈然自足。甚至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將，而後出村蒙之鄙夫，而揭榜自炫，舉朝遂推為孔明之流。其間最可恨者，以譌謬之言以欺人，或據庸妄以自異。[26]

茅元儀算是談兵者中確有真才實學者，他因為目睹談兵風氣熱潮下，多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者冒濫其中，所以，刻意寫作《武備志》以為鑑照與示範。顯然，由深悉兵學的茅元儀看來，當時談兵之風可謂已至於「氾濫成災」矣。且不論這當中諸人是否真具實料，在此可以看到嘉靖時代談兵的風氣進入萬曆時，更是越演越烈，相隨於國防情勢的更形緊張，不止是士大夫階層相率談兵，以至「以不

[25]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一，〈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頁 1163。

[26] 茅元儀，《暇老齋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133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光緒李文田家抄本影印），卷二，頁 601-602。

知兵為恥」，而且，他們更與「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如此一來，談兵風氣乃更擴大，瀰漫及於一般士人階層，甚而及於「出村蒙之鄙夫」，乃至「有拳勇之匹夫」。此外，茅元儀此處之觀察，正可與錢謙益所言相呼應。此所謂「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正顯示錢謙益所描繪出來的跨階層的談兵盛況，實則是士大夫之熱心招徠，而挾技者藉此以相投應召，有以致之。如此，一來一往，交相投合，故成熱潮。此熱潮乃由王朝之軍事危機，激發社會各階層試圖以武建功之心，此種武功的追求自明武宗首開風氣，而陽明樹立成功典範以來，相隨帝國危機之未曾或已，而持續不斷，甚至日益加溫，且不斷向下擴散，尤其士人階層，更爭相投入其中。

由茅元儀所謂：士大夫「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以致「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己與之交」，可見談兵熱潮中，武事之講求也已成為一種交游活動的憑藉，而在此種情境下，講武活動除了在「經世」的途徑中，建立「武功」之外，也可能只在社交場域中，用以開展交際活動。然則，經世脈絡下的武功追求，相應於帝國危機的持續，關心者眾，談兵活動日益擴散，上下援引，相互徵逐下，亦已開啟出不同趨向的社會活動，其中有在經世範圍之內者，亦有出乎其外者。它是一種社會活動，也別具文化意義。

陽明所處時代，正是明王朝開始出現國防危機之際，往後，此種軍事危機日益嚴重，一般文臣士大夫以至於儒生文士，乃更將其目光關注於此，因而武功的追求——包含武術與兵法——亦相隨成為一般士人的關懷要點，甚而，成為士人心嚮往之的一條人生途徑。也就是說從陽明之因「邊報甚急」而「留情武事」之後，有一個持續發展，且日益迫切的歷史情勢，強力地籠罩著明中後期的社會，因而處身其中的士人，不得不將武事納入其思慮之中，由此乃發展出「談兵論劍」的社會風尚。而在另一方面，王陽明卓越的武功成就，也使他成為一個光芒耀眼的標誌，他成了士人追求武功的典範，為一般士人提供一個輝煌的人生想像。我們不妨說陽明是個站在時代尖端的人，他敏感地觸及時代的脈動，也有力地開啟一個時代的新走向；他是一個開端，也是一個典範；由此起點，逐漸開啟出一套文化，一套武藝、武俠文化。

二・武學的講究與實踐

明中期以來，相應於王朝之危機不斷，談兵之風也日益昌盛，自君王、士大

夫，以至於一般士人，多有投入其中者，意圖以武建功。流風所及，亦多見私心圖謀雜乎其間，有企求驟得美官者，有自炫以求榮者，甚至有上下交相賊，冒稱知兵通武而得官得賂者。然則，容或此中不乏浮誇、冒進之舉，但在國危講武風氣的激盪刺激下，也帶動相關知識的追求，而此種兵學武術的講究，也成為「實學」的重要內容；或者也可以說，談兵風氣下對武學的講究，正是晚明「實學」發展的先聲。

弘治、正德時期，明王朝的危機主要來自北方異族的威脅，此種外患對一般地方官員或士紳而言，畢竟是邊境之事，事隔遠方，未必有切身之感。然而，嘉靖時期，倭寇入侵境內，蹂躪鄉里，江南士紳乃有切膚之痛，迫在眼前的生存危機，更讓地方官紳不得不講求武力以相因應。萬曆以降，外患內憂交相煎迫，更激發社會動盪，盜賊時起，社會不安已漸成常態，也是敏感士人的普遍感受。在此情勢下，武學之講究更見普遍，且別具現實意義。

（一）地方官紳的武力講求

由前述錢謙益與茅元儀的觀察，可見明後期談兵的活動，在京師地區已經以士大夫為中心，而更擴及於不同階層。然則，這種狀況不僅止於錢、茅之社交圈為然，甚至也不限於兩京地區，在地方上也可見此種談兵盛況。我們不妨由地方的角度來看武學的講究與實際踐履情形。《萬曆野獲編》卷一八〈江南訛傳〉中嘗載：

> 壬辰癸巳間，關白事起。婁江有士大夫，為桑梓計，厚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慕義者因相從談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一時子弟俱佻達少年，與同鄉紈袴輩，驟見馳騁決拾諸事而悅之。益務招集健兒同居處，乃至沈命胥徒場伶市棍，未免闌入，每出則弓刀侍衛，輿馬鮮華，人固已目屬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氣俠稱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為閩游客某，向撫臺許敬庵誇之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則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譽。」許老成人也，心獨疑，且私憂之。寓書於江南撫臺朱中丞鑑塘名鴻謨者，俾廉其狀。蓋許湖州人，恐有不逞輩，乘間竊起，為吳越憂，初不云諸公子蓄異謀也。朱素喜事，得書大悅，遂欲以為功，與幕丁偏裨輩謀之。此曹積為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變在旦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朱遽露章言之

朝，直云連結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諸公子。[27]

沈德符或因事涉時人，或為賢者諱，所言略有隱蔽，未具真名。事後追載之《堅瓠集》卷二〈豪放賈禍〉中則更直言道：

萬曆乙未，吳人以關白未靖，在位者皆謹備之。王鳳洲仲子士驌、延陵秦方伯燿弟燈、雲間喬憲長敬懋子相，俱自負貴介，士驌能文章，燈善談，相善書翰，各有時名，互相往來，出入狹邪，適遇海警，盡攘臂起。……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與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乃泛泛投刺富人，曰：「吾曹欲首事靖海島寇，貸君家千金為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或數十金，不則輒目懾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矣」，蓋意在得金。……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為亂，巡撫朱鑑塘（洪謨）檄有司擒治之。[28]

因為談兵而發展至被誣指反亂的冤案，這應該是一個頗為特別的狀況。不過，除最後刻意羅織罪名的情節外，此中有關日本的侵犯，激起士大夫的「募拳勇，習騎射」，以至「相從談武事」，而貴介子弟亦「盡攘臂起」之種種作為，概仍可視為一般社會風氣的反映。由這個具體的事例我們除可得知國防情勢的緊張，如何在社會激起尚武風氣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種尚武風氣下，相關的社會活動如何展開。《明史・日本傳》中言：「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29] 顯見中國一般民眾在國家政策的影響下，早已對日本心懷戒懼，其緊張心理本有歷史淵源，嘉靖以來的倭寇擾亂之事，更讓江南民眾談倭色變，以至於萬曆時日本的入侵，乃激起強大的社會效應。這個事例顯示，日本在邊境上的侵略行動，已經造成國內普遍的緊張，而士大夫階層因此激起保衛鄉土的意念，以至意圖建立武力自衛組織，這種意圖頗能引起響應，因此，武術的講究與練習，乃成為社會風氣。在此可以看到尚武風氣的擴散效應：本屬朝廷所需面對的國防問題，轉成士大夫階層的鄉土關懷，進而由士大夫階層，擴散至有心之士人，以至於庶民階層，都被捲入追求武力的漩渦中，而蔚為一時之風潮，乃至從中營結出一個極為活絡的交結活動。此處可以看到地方上饒富聲名的士大夫、縉紳子弟、稱俠之遊士，乃至於「沈命胥徒場伶市

[2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八，〈刑部・江南訛傳〉，頁 477-478。

[28] 褚人獲，《堅瓠辛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卷二，〈豪放賈禍〉，頁 7a-b。

[29]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二，〈外國三・日本〉，頁 8358。

棍」，都在追求武力的企圖或名目下，被號召、集結起來，由此構成一個頗為熱鬧繁華的社交活動。如此，武力之追求乃成為一種社會的動能，從中開展出別具意趣的社會活動。

陸世儀 (1611-1672) 與顧炎武約略同時，都屬江南名士，也都是強調實學的重要學者，他曾為江南之武術名家石敬巖寫傳，其中有言：

> 石敬巖，予所從受劍槊之師也。崇禎癸酉，平湖沈公萃禎備兵吾婁，時江以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蘭亭、趙英及少林僧洪記、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餘，猶力舉千鈞，盤舞丈八矛，龍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槍，妒公，憤言於眾，欲與公較，公與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予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甲戌流寇躪中都，圍桐城，公所與游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公與俱，公辭以老，英曰：「我輩平居以公為膽，公不往，我輩何所恃？」遂強公行。[30]

前述茅元儀的議論要點乃在辨明談兵者之是否真具實學，故其所論由批判角度出發，以高標準來指摘當時談兵風氣下多有冒濫之事。然則，士大夫之「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並非只是出於「以不知兵為恥」之心理而已，實際上，談兵論劍或招徠知兵者，也確有正面之求才效益，或者說，這當中實有不得已之情勢。在此可以看到地方官員在動亂的局勢下，在其職務範圍內不得不「留心武事」，乃招徠知兵者而與之遊。沈萃禎就是在這種情勢下，聘任、集結了不少身懷武術者在其幕府中，利用這些熟習武術者，協助組織、建立地方武力。

若再進一步追究石敬巖劍術之源流，則可發現此技乃有特別之傳承，且其得受此術，又與地方官之講求武力有關——陸世儀〈石敬巖傳〉中有載：

> 萬曆中白茆薛四甍以鹽盜為橫於海，海虞令耿公橘陰募力士數人，斃之，公其一也。應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擊劍之術，故公之劍實耿公所授。[31]

可見石敬巖之劍術得自耿橘，而耿氏之所以傳授劍術，則在常熟縣令任上為建立武力以制當地鹽盜。耿橘於萬曆三十三年擔任常熟知縣，到任後即對當地進行詳

---

[30]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8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唐受祺刻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影印），卷六，〈石敬巖傳〉，頁 519。

[31]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六，〈石敬巖傳〉，頁 519。

細考察，發現當地治安敗壞，臨海地區多有盜跡，尤其鹽盜勢力龐大，橫行無阻，其中薛氏更屬巨魁，耿橘立意翦除之，關於此《涇林續記》亦見記載：

> 常熟薛四興販私鹽，招集亡命，出沒海濱，殺人刼財，白晝公行，人莫敢格。……令耿橘素悉薛橫暴，併其平日惡蹟百端，申報周撫臺見魯，擒其父子併黨與，咸寘重典，一方以靖。[32]

張鼐之〈瀛海耿公墓志銘〉亦有言：

> 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為民興便利。邑有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略，邏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泊湖中，夜半群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株擒治其魁。[33]

經過倭亂之後，常熟地區官府威望低落，社會上充斥暴力之氣，「打行」四處橫行，頗有抗衡官府之意味，一般民眾「不得志於官府，必肆志於打行」，多藉以報仇復怨。[34] 另一方面，因地濱江海，私鹽可獲重利，[35] 以致走私盛行，且形成一個勢力極為龐大，無視官府的走私集團。在此情勢下，擔任濱海縣令的耿橘，不得不培植鎮暴力量，為打擊薛氏之走私集團，他細密籌劃，暗中招募勇力，親自教授劍術，培植自己的核心武力組織，最後再設謀誘敵，利用奇擊戰術，一舉擒獲盜黨。如此，動亂的時代下，地方社會多有乘機而起之惡勢力，有為地方官為平治亂事，不得不強化地方武力，乃至建立特別的制暴組織，耿橘與石敬巖即在情勢下，以武相會，也建立了武術的傳承，而此武術往後更傳及陸世儀。這種武術「傳統」的建立，殊非偶然，蓋時危世亂下，講武乃時勢所趨，志士勇夫因

---

[32] 周玄暐，《涇林續記》（收入王雲五主編，《涵芬樓秘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第 6 冊），頁 29。

[33] 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6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刻本影印），卷一六，〈瀛海耿公墓志銘〉，頁 451。

[34] 耿橘，《常熟水利全書》（萬曆抄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一，〈驅打行惡少歸農〉，頁 29b-30a，中記道：「打行之風本縣頗盛，成群合黨，攘臂挺身，不論是非曲直，惟以必勝為主，凡愚民有報仇復怨之事，爭投其黨，倩其人交拳者、喝采者、得勝者，論功稱謝，甚且打至辜限外某月日死，其期不爽。無論城外，山川壇一帶，為此輩之戰場，即衙門前，叢叢簇簇者，皆是也。無論小民借交報仇，即官僕狐假虎威，出入衙門，往往挾此輩以為重。不得志於官府，必肆志于打行。世衰教微，風俗大壞，漸不可長。」

[35] 耿橘，《常熟水利全書》卷一，〈驅販鹽無藉歸農〉，頁 30b，載：「本縣地濱江海，兼以白茆、滸浦、福山、三丈諸港，與通州、崇明各塩場徑對風帆，一指俄頃可達。且于彼每塩一觔價不過一釐幾毫，于此則五六釐矣。」

而同氣相求，聚會談兵外，以武相傳亦屬自然。

如耿橘、沈萃禎那般建立地方武力以維持治安、保衛鄉土之作為，自明中期以來，社會動亂時見之際，即不難見及相類事例。早在正德年間，羅洪先之父羅循任職山東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是時宸濠不軌，沂邳間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授將士方略，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眾。則為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36] 又如《九江府志》中載：「陸夢龍字君起，會稽人，由進士官九江兵巡。……夢龍遠識，逆知釀亂，預召募健兒五百，教之技擊，號稱『標兵』。九江之有標兵，自夢龍始。後十餘年，而西北盜起，卒如所料。」[37] 或如《江南通志》載：「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崇禎時任漕撫，訓練鄉兵，招集義勇。他郡多為寇躪，而淮獨安堵。」[38] 諸如此類有見識、有作為的地方大員，深悉動亂已迫在眉睫，為穩定地方秩序，敉平動亂，乃積極建立地方武力。而其得以如此，乃因他「抱經世略」，而平時即留心武學，故可學以致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談兵論劍風氣下，有心士人跟隨潮流，學習此種流行知識，而終於得到機會運用所學，用武有功之故。

除了這些有識官員的早為籌謀外，也有地方士紳投入此武裝工作者。事實上，明中期以來，頻繁的社會動亂，已逼使各地官紳，尤其具有經世思想者，不得不設法招募能武勇夫，建立武力以保衛地方，這種情形應有其普遍性，而嘉靖倭亂，應是重要動因。當時，少數倭寇縱橫自如，官兵無能阻擋，國家正當防衛系統破綻百出之際，有為官員及有心士紳只得設法另組武裝力量以自衛。如侯一麐所撰〈仁山王先生傳〉中言：

> 若吾郡仁山王先生者，當文忠張相國時，尊貴他相無與等，而先生親相君姊子也，伯兄禮部，仲兄考功，又皆負天下聞。……至壬子，倭寇起，……於是召諸子弟諭之曰：「群盜亦狐鼠耳，吾鄉雄一郡，不當聚兵稽保乎？獨奈何使先人廬墓一旦委盜賊，尚安生為？」則相與懸金募壯

[36] 氏著，《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先大夫傳〉，頁 733。

[37] 江殷道等修，張秉鉉等纂，康熙《九江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華中地方第 736 冊，據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影印），卷八，〈名宦・陸夢龍〉，頁 823。

[38] 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收入《四庫全書》第 510 冊），卷一一二，〈職官志・名宦・路振飛〉，頁 296。

士，士日嚮應。後數歲，丙辰，寇自楠溪渡江，則提兵拒上金，寇跳海去，頗有擊獲。自是人始知兵，無不樂為先生用者矣。[39]

這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紳在動亂時，倡議建立地方武力，以保鄉衛土。明清士紳本對地方社會極具影響力，而在動亂之際，挺身而出，號召保衛鄉里，大概不乏其例。在此類官紳的召募下，也確實有武勇者應召募而起，如李維楨之〈千夫長吳君墓志銘〉中載：

君名良瑞，字惟信，少時受書，恥為章句學。……比長，軀幹魁梧，類河朔健兒，工騎射，習金版六弢之說，叩囊底智，因應無方。……郡武備弛，倭蹂躪若入無人之境，向後苦多盜兵。使者募士得君，徼巡江上，主名不立。推舉具得事實，設謀開賞，宣示反悔，盜無所容，鼠竄出界。[40]

這種意圖建立武裝之士紳與具備武術之勇夫相互為用，共同投入武事之事，在嘉靖倭亂所及之處，大概相當普遍，甚而擴及於商人與無賴——王世貞〈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姥合葬誌銘〉中敘及洞庭富商春山翁出貲募兵保鄉之事：「時倭已躪西洞庭，處士捐槖募惡少年衛其里，里得無犯。」[41] 可見動亂時代下，出錢出力，共襄武事，乃時勢使然。事實上，王世貞本人即曾在倭亂時，結交地方豪俠以建立地方武力，其〈贈楊憑序〉文中有言：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跅弛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摴蒱，决數十萬一擲，雖資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鬬，尤以信義稱。既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為楊君死。甚或鷙桀亡狀，衆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力。……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讎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

[39] 侯一麐，《龍門集》（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 35 冊，據明隆慶本影印），卷一九，〈仁山王先生傳〉，頁 224-225。

[40]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集部別集類第 152 冊，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卷九〇，〈千夫長吳君墓志銘〉，頁 594-595。

[41]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收入《四庫全書》第 1283 冊），卷九二，〈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姥合葬誌銘〉，頁 322。

大樹下，料羣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42]

顯然，此「任俠」之楊氏兄弟應是擅長武術，習於戰鬥，而以武力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強——王世貞在此序文中且以朱家、郭解、劇孟相比擬。王世貞為文壇領袖，負天下盛名，里居時為聲望崇隆之鄉紳，兩者活動領域差異甚大，然而社會動亂為兩者製造交往契機，倭寇的武力威脅下，士紳不得不建立武裝以自保，原本擁有武力的豪強，乃得為所用。如此，以文筆主盟全國藝苑之文壇領袖與以武力雄霸一方之地方豪強，在動亂的時代下，乃相與談兵，攜手建立地方武力，共同維護鄉里安全。

這類望重士紳號召建立地方武裝之事，可能在嘉靖倭亂時，即已掀起高潮，其情況大抵如陳與郊所言：「今天下謀倭者藉藉矣。樞臣當軸而圖，臺省臣簪筆而議，樽俎奮越之臣蒿目而畫，山澤蒙放之臣扼腕而封事，即逢掖之豪，韋布之俠，以至齒危髮秀（按：應為「禿」）之老，無不聚族而譚。」[43] 王世貞等人即在此情勢下，相率參與武事。其後，倭寇問題大致解決後，此種武裝行動卻未隨之告終，蓋相應於明王朝的內憂外患，地方社會盜賊頻傳，有識地方官紳，如耿橘者流，仍不得不講究武事以保衛鄉里。至於萬曆後期，滿州崛起，流寇相應作亂，武裝追求更趨熱烈，事此者不乏其例。陳鼎所撰〈江參軍傳〉即有載：「崇禎末，流寇熾中原，（江）天一厭制舉業，仗劍談兵，慨然有澄清志。時休寧金正希聲以翰林講學里中，教民聯保甲、設鄉勇以備亂，天一遂師事之。」[44] 凡此

[42]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四庫全書》第 1280 冊），卷五六，〈贈楊憑序〉，頁 23-24。

[43] 陳與郊，《隅園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160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至天啟元年賜緋堂刻本影印），卷八，〈備倭擬程〉，頁 505。

[44] 陳鼎，《留溪外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 122 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影印），卷一，〈忠義部上・江參軍傳〉，頁 418。汪琬另有〈江天一傳〉載：「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帓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四庫全書》第 1315 冊），卷三四，〈江天一傳〉，頁 559-560。

也正顯示士人的談兵論劍乃與鄉紳之號召武裝相呼應，互為所用，此亦可謂乃時勢使然也。

要之，明中期以來，遠識有為之地方官員，如耿橘、陸夢龍、沈萃禎者流；圖謀保家衛鄉之里居鄉紳，如王世貞、王仁山者流；自命不凡或意欲有為的士人，如吳良瑞、陸世儀、江天一者流，都積極投入兵學、武術的教習活動，以備「出而用世」。如此，這些相關地區的官員衿紳士子，或目睹，或遠見，都察覺時代的動盪；以故，或因官職所需，或因關懷所至，都在此現實動亂之壓力下，或倡導，或向學，積極投入武事之講究。凡此概可見知，時勢所至，風潮之下，兵法、武術已成當時之顯學，尤其是有心經世者，多不得不留意或致力於此。王世貞、王士驌父子，一為望重鄉紳，一為少年才子，卻先後參與地方武事，且態度日益激切。耿橘、石敬巖、陸世儀之輾轉傳授武術，這也顯示，嘉靖至萬曆，以迄於明末，社會上談兵論劍風氣確有越演越烈之勢，而士人對武術的涉獵也越來越有迫切感。

要之，在動亂的情勢下，武術的講究成為社會普遍的需求。而在此種需求下，武術也成為社會上極具競爭性的一種技能，以致武術家彼此之間也見有相互較量之情事。陸世儀有關石敬巖傳記中，有善使梨花槍之程姓武師向石氏挑戰之事，除可說是個人的逞強好勝外，也可說是尚武風氣盛行下，各方官員、士大夫競相徵求武人，而武人乃相應地求為所用，並爭取受到重用，也因此刺激武術成為一種極具競爭性的技能或行業。也就是說尚武風氣下，武術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社會活動，進而發展成一個獨特的社會領域，以至於成為充滿競爭性的場域。由此事例，也可以具體看見，武術已經在社會層面上有一定的活動空間。陸世儀與石敬巖之交往即為其中之一例。陸氏與石某並無直接之職務關係，卻因陸氏存心經世，而慮及將有用武之地，所以，延聘敬巖，向他學習槍法。這正是一個文武間流動、互動關係的開展實況。

（二）實學脈絡下的兵法武術

國家之軍事危機，激起當權者的危機感，自中央至地方，朝廷官員與敏感士人，都覺有講究兵學之必要，這種由危機感激起的談兵風氣，在明代後期社會極具擴散性，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知識意涵。除了部分知機或投機官員之試圖藉機以武建功，或時尚激進士人之追逐風潮，以談兵為由相互徵逐嘯聚外，這種時代氛

圍，也已深入一般士人心中，影響其知識態度與取向。顧炎武 (1613-1682) 曾回憶自己的讀書歷程道：

> 臣祖父某，蓋古所謂隱君子也，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爲孫。臣幼而多病，六歲臣母於閨中授之《大學》，七歲就外傅，九歲讀《周易》。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亘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及臣讀《周易》爲天啟之初元，而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並反。其明年，廣甯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45]

顧炎武提倡「實學」，開啟有清一代之新學風。由此學思歷程之回顧看來，其講究實學之淵源乃肇端且奠基於其祖父之教導，而其祖父開始教導他涉入實學，則自閱讀兵書始肇其端，其所以如此，則又與時代之動亂因緣相結。顧炎武將其學習歷程與時代動亂相結合，由此亦可見時勢演變與知識趨向之密切關聯。顧氏之求學過程中，正當滿州崛起，明廷窮於應付之際，外患內亂乃更交互激發，西南邊境及境內教徒，乘機作亂。此種危急情勢，使當時有識之士深感憂心，顧炎武祖父於感時憂國之際，乃要求炎武涉獵兵學知識，後來更教誨他「當求實學」，此實學內容也包含「兵農」項目。顧炎武的祖父並未在朝為官，顧炎武所謂「蓋古所謂隱君子也」顯示他個性淡泊樸實，非如王士驌者流之佻達張揚，在喧鬧場合中高調談兵，然而，如此隱君子也在時勢影響下講究兵家之學，談兵時勢之普及亦可見一斑。同時，顧氏之留意兵學也顯示晚明之講武風尚，除了在政治場域中試圖以武建功外，另有其知識面向。

天啟初年，滿州興起，明王朝內憂外患日趨激烈，這應是顧炎武涉入兵學之要因。然而，其祖父之關懷時勢，強調實學，講究兵家書，則更是早有契機。如前所言，明王朝之軍事危機早在武宗時已發其端，嘉靖時之倭亂，更直接威脅江南紳民，因而激起談兵之風，顧炎武祖父之講究兵學，亦可謂乃此種時勢使然。相對而言，由顧氏祖孫之涉獵兵學亦可見，時危談兵風潮下，士人涉入武事，除外在性地追求「武功」外，也影響知識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說，晚明的談兵活

[45] 顧炎武，《亭林詩文集》（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正編，第 77 冊，據上海涵芬樓藏誦芬樓刊本影印），〈亭林餘集・三朝紀事闕文序〉，頁 8。

動，除可視為政治或社交活動外，它也是一種知識活動，可以歸納於「實學」的脈絡中。

顧氏祖孫有感於國家危機，開始將兵家書列為重要的求知範圍，此種「談兵」確實深具「實學」旨趣。只是，顧氏之涉入武學，似乎偏重於「理論」的探究上，在實際戰術與武技方面，恐怕不如唐順之那般兼通兵法與武術，且得以實踐有功。然則，唐順之亦非特例，明中期以來，在實學脈絡下「談兵」而兼通兵法與武術者實不乏其人，陸世儀與耿橘亦屬此類。

耿橘在常熟縣令任上，治績卓著，申時行稱讚他：「卓有才諝，而本之學問。其知略足以殲夷大憝，而不露芒穎；其精明足以洞燭幽隱，而不任鉤距；其强力任事能興廢舉墜，而不以炫霍為奇。……以余所覩，近時賢令神明卓異，未有如侯者也。」[46]《大清一統志》將之列為「名宦」，而載道：「耿橘瀋陽衛人，萬曆中知常熟縣，首復子游書院，講求水利，開濬福山塘、三丈浦、奚浦、李墓塘、梅李塘、貴涇、横瀝湖、漕横浦、六尺溝等河，工畢而民不擾，邑民世享其利，著有《常熟水利興革》、《實政》二書。」[47] 耿橘在常熟所進行的水利建設，及相關之賦役改革，確是成就斐然，且深具歷史意義。[48] 凡此優異政績乃「本之學問」，陸化淳為其《常熟水利全書》寫序時說他「留心經世」，[49] 可見他是個強調「實學」的士大夫。然則，其實學乃包含武學的講究。董其昌在〈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中嘗載：「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弱冠補博士弟子，即卑卑帖括，博雅好古，冀為當世鉅儒，……漁獵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制，無不精討，……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韜鈐，公與上下其論，聲氣莫逆，嘗密迎公詢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50] 據此看來，耿橘與許少微都是「實學」之士，而其實學中乃包含兵法項目，兩人即在講究實學之心態下，相與「談兵」。耿橘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明中期講究實學的

---

[46] 申時行，《賜閑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134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一一，〈海虞耿侯考績貤恩太孺人八十壽序〉，頁 236-237。

[47] 和珅等奉敕著，《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四庫全書》第 475 冊），卷五五，〈蘇州府二・名宦〉，頁 122。

[48] 濱島敦俊，〈業食佃力考〉，《東洋史研究》39.1 (1980)：118-155；中譯收入李范文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 2 冊，頁 123-163。

[49] 陸化淳，〈常熟水利全書序〉，耿橘，《常熟水利全書》。

[50] 董其昌，《容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2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影印），卷八，〈文集・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頁 350。

範例，而其實學中兵學、武術乃與水利並列，這些方面的深究，也確實讓他可以實學實用，以之平亂興利。

耿橘在實學意圖下，講究兵法劍術，這種技能在其地方官職任上，發揮極大的作用，使其能以武力建立官府威望，穩定統治。同時，他在建立地方武力之時，將劍術傳授石敬巖，石敬巖乃又以其武術，幫助地方官紳建立防衛武力。之後，陸世儀又出於實學理念，向石敬巖學習武術。這整個武術的傳承過程顯示，明代後期時局動盪，國防安全與社會治安都備受考驗，在此情勢下，企求穩定地方秩序之官紳，以至於感時憂國的士人，基於保鄉衛國或者統治上的需要，率多認為武力講求事屬必要，是為實學之要義。如此，兵法、武術也成為實學之重要內容。是故，談兵論劍與經世實學乃得並行不悖，甚至可以相互發明，體用並進。

陸世儀本身是個講究實學的學者，他有關石敬巖記載也充滿「實學」的意趣。在其敘述下，石敬巖是一個具有真材實學的武術家，而其武術也被用來作為地方防務，如此，武術的追求完全是為了實際的需要，武術是在實用的態度下，被納入考量且付諸實踐，故武學因而也成為實學的一環。事實上，如陸世儀這般在現實情勢下的習武活動，甚至到了明王朝已然潰決時，猶未休止。湯斌在〈處士孫君傳〉中嘗載：

>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甲申，年十五，……值流寇陷京師，……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51]

孫博雅之父孫奇逢在明末多歷世事，而主張實學，且在崇禎十一年時，攜家避難百樓鄉，相從者數百家。崇禎十六年，孫氏移居五峰山，在此組織鄉民，修築山寨以自保，並曾與流寇發生激烈戰鬥，擊退流寇。此處所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正是孫奇逢結寨五峰時情境之寫實，而孫博雅的攜書獨坐，也具體表徵、對照出亂世文武之冷熱有別。蓋亂世之際，兵事迫在眼前，斯屬實務，而讀書反為不急，甚或不實之務。

湯斌為孫博雅作傳時距明末動亂已有些許時日，故其文中對當時「弄弓矢刀劍譚兵事」，略有冷眼旁觀之意味。不過，回到當時情境，則在時代動盪下，孫奇逢等人之講究兵學，實是在緊張情勢下不得不然。魏裔介所撰之〈夏峰先生本傳〉載道：

---

[51] 湯斌，《湯子遺書》（收入《四庫全書》第 1312 冊），卷七，〈處士孫君傳〉，頁 556。

> 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眾。公飭武備，輯人心，為守禦計，誓神告眾。暇則講禮興學、誦詩書、修冠禮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52]

在相當程度上，此處所述可視為晚明「實學」學者在特定時代氛圍下，學術內涵具體而微地展示。這段文字具體地描述孫奇逢如何在時代的動亂下講文修武，由其禮樂與武備兼施並舉之作為，略可想見一位學者如何在現實情境中實踐其所學。這是學術與現實之間最為緊張、密切的對話。正是在時代動亂的大背景下，學術的活動不得不注目於現實的需求，因而武備的講求，乃得與禮樂之學相提並論，交互為用。也就是在這種時代氛圍與現實環境下，兵法、武術乃與詩書禮樂之學有了「親近性」的關係，此兩者之兼施並舉，交相為用，殆可視為實學之發端。而由此亦可見孫氏之講究兵學，乃明後期現實情勢逼迫下不得不然之舉，而其「實學」之講求，將兵學納於其中，實亦時勢使然。其學術與作為，亦足為時代之見證與表徵。

孫奇逢之講文修武並非只是特定時代下的特立獨行，事實上，除了當時動亂之際，相從避亂者於五公山寨中共同「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外，其後更有傳承其學者。王源的〈五公山人傳〉中載：

>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偉岸，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搆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氅，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閒，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慰藉。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剉薦接之，有急更為措置，百數十金無難。……常彙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

[52] 魏裔介，〈夏峰先生本傳〉，孫奇逢著，朱茂漢點校，《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5。

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53]

王餘佑名列《清史稿・儒林傳》，傳中言其「嘗受業於孫奇逢，學兵法，後更從奇逢講性命之學。……教人以忠孝，務實學。」[54] 而四庫全書編輯對其所學評論道：「其學則出自容城孫奇逢、定興杜越，以砥礪品行、講求經濟為主。……然恒以談兵說劍為事，又精於技擊，喜通任俠，不甚循儒者繩量。」[55] 由此可見孫奇逢之講究兵學，乃與時代之動亂相糾結，然而其學並未因動亂平息而消失。孫氏在明末講究武學，可謂乃時勢使然，事非得已。蓋其處身天下多事，人無安枕之際，不得不學兵以自衛。因此，其兵戎之際又講禮誦詩，多少有不得已從戎事武而志在禮樂之意。然則，在明亡亂平之後，王餘佑乃更與之傳播武學。此所謂「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顯見孫氏前此之修武間以講學，兩者分舉並行，至此則已是相互交融，合而為一，而籠統歸納為「實學」。從鋒鏑時傳為守禦計飭武備到歸隱務實學兼文武，從亂世用武到平時講兵，從孫奇逢到王餘佑，這正是一個兵法、武術由現實需求，轉而成為學術內涵，且以此相傳承、傳播的發展過程。

事實上，自嘉靖以來在談兵的風氣下，武學就已被部分士人納入其知識範圍內，而具有「實學」的意涵。由正德時蒙古威脅下之王陽明、經嘉靖時參與剿伐倭寇之唐順之、萬曆時平治地方盜賊之耿橘，以至於流寇威脅下，意欲有為的陸世儀，垂及於在亂世中實用兵學，結寨以保家衛鄉之孫奇逢。這些都可說是在歷史環境與現實情勢下，出於現實的需求而投入談兵習武之活動，而其習武活動，也都回歸圖用於現實，所以，這種武學大抵可歸納於「實學」範疇中。此種將武學納入一般士人知識範圍之作為與主張，幾乎可以說是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特色，除前述陸世儀、孫奇逢等知名學者身體力行之外，傅山、魏禧、黃宗羲等人之所知所長也多涉及兵法或武術，而唐甄亦且直言：「君子之為學也，不可以不

[53] 王源，《居業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8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讀雪山房刻本影印），卷四，〈五公山人傳〉，頁 125-126。

[54] 趙爾巽等編纂，《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四八〇，〈列傳二百六十七・儒林一・王餘佑〉，頁 13136。

[5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卷二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八・五公山人集〉，頁 846。

知兵」、「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亡矣。」[56] 此外，清初重要學派顏李學派之創始者顏元則更將武術教養列為其學說之重要內涵，且其本身即具有高深的武術素養，不過，顏李學派之重視武技兵學，除可說是個人偏好外，更可視為歷史與現實情境的反映。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武術之講究乃顏李學派之重要特色，而武學之成為學說之重要內容，乃至成為學派之特色，這可說是自明中期以來，在特定時代氣氛下，士人持續投入武學之講求，流風披靡，習染日深，積累厚重，有以致之。事實上，顏元之學深受五公山人王餘佑之影響，而王餘佑之兵學則承襲自孫奇逢。這種淵源流衍，可說實為整個時代、現實與學術相互交纏推行的反映。陳登原曾評論顏元性格道：「習齋在二十以前，頗類豪傑一流人。」由此又引申言道：「清初大儒，類多由豪俠一路入手。非乾嘉間，章句犬儒，所堪擬期也。」[57] 此種「豪俠」實與尚武之習密切關聯，乃至互為因果，而這種關聯與特色，也可說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徵與顯映。

明中期以來，王朝的國防危機，引發兵學——兵法與武術——的需求，自朝中卿大夫、地方官員、縉紳或一般士人，以至於各類閒雜人等，多有投入談兵論劍活動者，此種兵學之講求出於現實之迫切需要，也有其現實意義。具有兵學素養、能力的人，其上焉者，可以藉此實踐其「經世」理想，建立「武功」，建功於史冊，王陽明斯為此中之模範；其次焉者，可藉以保家衛鄉，求存於亂世，建功於親族鄉里；其下焉者，則以此求倖進，建功於個人前途。此為武功之途。另一方面，武學知識也相隨於現實的需求，而逐漸納入有心士人的學習講究的範圍中，且在知識的版圖中，日趨顯要地位，以至於成為講究「實學」者之關注重點，將之納為「實學」之要項；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妨說，兵法、武術之講究，已成為迫切的現實需求，有關於此之講究，乃發展成為「實學」要義。以至於有將武學列為其學術之講求主軸，而成為學派之重要特色。如此，則武術又被放置在學術範疇中，成為重要的學術內容。

以上所述，乃將兵法、武術之「武功」與「武學」意涵之討論。這兩者都有很強的現實性，可以說是武術之現實意義的開展。

---

[56] 唐甄，《潛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95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達刻本影印），〈下篇下・全學〉，頁 489-490。

[57] 陳登原，《顏習齋哲學思想述》（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9），頁 33。

三・武藝的展演

弘治、正德期間，如王陽明那般，在外患刺激下，有追求武功之心而積極講究武學，殊非特異之事，自古以來，不乏有心士人嘗試為之。然而，除此「傳統」士人抱負外，嘉靖以後的談兵論劍，乃更有別具趣味之處。蓋明中期以來，相隨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生活日趨繁華，士人也多在其中展開各種社交與游樂活動，而談兵論劍的活動乃更與此城市社交活動交相激盪，也因此武學之講究，乃別具一種游藝色彩。這種「武」與「藝」的互通相融，可以說是明代後期武學文化發展的特色。

固然，明後期之談兵活動有其現實激力，亦多有著力於現實、力求實踐者，但士人之習武，卻未必能全歸納於「實學」範疇中。武學的內容，尤其武術的部分，其實還含有相當程度的個人性，甚至是游藝性的成分。而這種「武藝」乃更可能被安置在不同的場合，呈顯不同的文化意趣。也就是說武力的追求，不只可以安置在「經世」的脈絡下，將之視為一種可以救濟現實的學術；它還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踐之道，一種人生姿態的表白，是一種個人性格與社會文化的表徵。

屠隆《娑羅館清言》中有「少年意氣豪，老來禪心靜」條目，中言：「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58] 角弓玉劍與桃花春衫相照映，躍馬舞劍，正足張揚年少豪氣。這多少反映晚明士人之熱衷談兵論劍，乃與其城市游樂、任俠心態密切相關，而在此情境下涉獵武術，乃深具「游藝」趣味。是故，晚明士人之愛好「武藝」，可以放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脈絡下來解讀。以下且由此來思考武學另一個別具意趣的內涵。

（一）城市生活中的任俠心態與武術展演

明末的南京是一個高度繁華，且為文人聚集、文藝風尚極盛的大都會，即使在明王朝風雨飄搖之際，甚至亡國前夕，南京的繁華乃猶未稍歇，甚至可以說，社會的動盪，反倒激盪出一股異常的熱鬧喧騰，關於此，可由《桃花扇》之描繪窺其大略。除《桃花扇》外，《板橋雜記》更可說是身歷其境者所刻意記載之重要時代見證。在此書的記載下，南京城的末世繁華，躍然紙上，在此動亂且繁華

[58] 屠隆，《娑羅館清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百齋刻本影印〕），卷上，頁 3。

的時代背景下，晚明士人之精神意態，亦燦然可觀，以下這記載即頗具表徵性：

> 萊陽姜如須，游于李十娘家，漁于色，暱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并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帘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拍張，勢如盜賊，如須下床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59]

方密之（以智）與孫克咸兩人在日後都因明王朝的敗亡，而有極大的人生轉折，方遁入空門，孫則舉兵抗清，終而殉明。此處所記載之情景，則是在大難來臨前夕，兩人跌宕快意之情景。明亡前夕，諸多才子名士聚集於南京，這個記述一方面生動地反映出當時這些才子們的輕俠狂盪之行為特色；另一方面，此記也透露方、孫兩人，都精通武術，而且，其武術正與其狂俠行徑相互濟用。事實上，這個敘述可直接視為任俠心態的具體演出，此中姜如須的「漁于色」與方、孫兩人的「屏風上行」，都可視為任俠行徑，而且，學習武術與徵逐情色都是明中期以後，當時文人常見的行為表徵，習武也如狎妓一般，俱屬任俠心態轉化為行為的重要表現之一。

在此，我們不妨對方以智、孫克咸的習武與任俠行為作更進一步的考察。《明詩紀事》引《蠶尾續文》稱：「武公（孫克咸）少讀書任俠，與里中方密之、爾止、周農父、錢飲光齊名。所為歌詩、古文詞，流傳大江南北。好談兵，手製木牛流馬，式著平地，能自旋轉如生。」[60] 可見，孫克咸實頗負「任俠」之名，至於其任俠與尚武之關係，可由方以智叔父方文之〈為孫克咸三十初度兼送其移居〉詩中，略見端倪：

> 我友多才子，君兼任俠名。抽毫勤賦物，聚米善談兵。壯節忽已至，雄圖猶未成。佩刀閑掛壁，風雨欲悲鳴。故鄉不可住，同寓石城偏。秋水雙橋月，春雲萬井煙。何當遷草舍，知為拾花鈿。欲訪丹砂術，還尋葛稚川。[61]

此詩中所謂「抽毫勤賦物，聚米善談兵」隱約表露孫克咸之任俠行徑乃形諸於文武兩途中，而「佩刀閑掛壁，風雨欲悲鳴」之句，則更暗示其欲憑藉武術而有所作為。關於其文武兼修並成，余懷有更直接而詳細的載記：

---

[59] 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下，頁 63。

[60] 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 5 冊，頁 2928。

[61] 方文，《嵞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1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影印），卷四，〈為孫克咸三十初度兼送其移居〉，頁 463。

> 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62]

《板橋雜記》以南京妓院為舞臺，記述其中才子佳人之種種風流韻事，孫克咸是此中名人，他曾和兩位名妓——王月與葛嫩——有過密切交往。在此，余懷生動地刻劃孫克咸的任俠心態，具體化地展現於武術、文藝、狎妓之中。余懷充滿文學性的描述外，錢澄之的〈孫武公傳〉更具體地描述他：

> 資質明慧，於書傳略一涉獵即解大義，娓娓談說，或措之筆墨，皆已成章。尤工詞賦，著作盈尺，……為人風流俊爽，曉聲伎，吹簫度曲，間游平康里，即人人得孫郎一顧為重，克咸亦遂以是沾沾自喜。……是時，寇氛初熾，雲間夏瑗公、陳大樽、徐復庵輩起為古文詞，講求當世治亂禦侮之略，著為兵家言。克咸心好之，遂談兵，於騎射擊刺之事無不習也，亦無不自以為能也，……一夜酒酣，談時事，慷慨激烈，引一指然燭上，自誓：「不滅賊者，有如此指！」遂改字為武公。……武公自是常衣短後衣，騎生馬，左右葫蘆，插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是儒生也。……武公有所昵妓，常大雪中挾之往游鍾山下，與其內弟方直之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袴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予之騎，前騎騁，後騎亦縱，騎者危慄欲墜，以為笑樂。既至，就梅花前氍毹席地，下馬踞坐，置酒聽吳兒弦曲。數闋終，乃舉觴政，妓為糾，苛罰百出，皆盡醉極歡，復馳而歸。[63]

在此傳記中可見，孫氏之狂放任俠，確實非比尋常，他以極為誇耀張揚的方式，在城市中展現其雄武豪俠之氣概，而其武裝狎妓縱樂也成為南京城中的鮮明景象。然則，由此敘述亦可見，其好武且以武炫人，除可謂乃個性豪俠使然外，更可說是整體時勢學風推動所致。而且，此中談兵習武、好古文詞、乃至狎妓游樂，實多有親近性關係，這都可視為晚明城市文化的鮮明風景，這些景象的浮現，都與士人的自我展現有關。

孫克咸的好武與城市游樂相互交融，成為一種充滿表演性的作為，在此誇張的表演下，又抱持何種心態呢？其少年知交方以智在〈孫武公集序〉有言：

---

[62] 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麗品・葛嫩〉，頁 25-26。

[63] 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卷二一，〈孫武公傳〉，頁 406-407。

> 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園，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年以來變亂狎至，不自我先，故鄉為艸竊殘逞，又益之暴寇旁午，流離於外，其悲愈甚，克咸改號「武公」。出入危城，親當矢石，擐控之餘，狂歌不廢，豈惟窮愁而後作耶！方今匈匈，所可□腕者非一事，勿謂艸野生無與也。故每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又自怪其處末世，非所宜矣，有喙三尺，安所不得吾嗚嗚乎。……後世有讀其詩者，問其改號武公，何意？意已倉況矣，左張弓右濡毫，盾上磨墨，下馬露布，奮臂以當車轍，亦非詩人之幸，又況不然，誰寔用汝。[64]

這段表白可以看出當時不甘於平庸之士人意氣相高，且時時欲跳脫於世俗世界的精神意態與交游情境。這是別具才氣與能力，因而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又互相激盪澎湃的情感，乃至刻意抵觸、抗逆世俗眼光，而以誇張的方式張揚自我，以「狂生」自許。此種激越的精神意態，處當動盪的時代，乃激使此種狂氣，更往「武」學方向發展，孫克咸乃至因此而改號「武公」。相應於此，政治的不安，更激發其參與之心，促其「好言當世之務」；而社會的動亂，且提供了一片英雄「用武」之地，使其確實「出入危城，親當矢石」；甚至，甲申之變後，他更起而參與抗清之軍事行動，以至兵敗被殺。如此，士人內在的壯懷激烈，加上外在社會情勢的動盪不安，激發出一種向文武兼修互濟，「左張弓右濡毫，盾上磨墨，下馬露布」的文人類型。

方以智與孫克咸兩人的意氣相投，除了展現於詩酒狂歌外，其所謂「所志同」，也並不僅止於文藝一途，方以智對孫克咸的武術造詣，不只是旁觀欣賞而已。事實上，方以智本身在武術上也頗感興趣，且有相當造詣，《桐城耆舊傳》中謂其：「凡天人、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下逮琴劍、技勇，無不析其旨趣。」[65] 陳子龍也說他「十五，通劍術」。[66] 方以智的喜好講兵舞劍或許在相當程度上，出於其個人特重「博學」之知識取向所致。不過，除此個人

---

[64]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二，〈孫武公集序〉，頁 483-484。

[65]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四十一輯第 409 冊，據清宣統三年刊本影印），卷六，〈方密之先生傳〉，頁 305。

[66] 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卷七，〈聞桐城亂久矣，龍友從金陵來，知密之固無恙也，甚喜。又以久不見寄書，寒夜有懷，率爾成咏〉，頁 230。

因素外，在當時社會中，習武也確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方以智之弟方其義，雖晚生他十年，卻也躬逢習武熱潮，因而步隨兄長，文武兼修，且其武術造詣，亦不遑多讓乃兄，錢澄之〈前處士方次公直之墓表〉中記道：

> 君（其義）勇力過人，能挽强弓，騎生馬，嘗與諸將角射，出其弓，諸將引之，皆盡力，不至彀，君取諸其手，一引遽滿。又取兩弓，中約其跗，張左右臂分擘之，開合者數，略不變色，一軍盡驚。中丞公禦賊，徒以君能先士卒、敢深入，諸將素讋服於君，爭致死以取勝也。已，中丞公被讒譴戍越東，卒遇盜，君出舟與鬬，失足墮水，浮至舟尾，一躍直上柁樓，大呼，連發數矢，羣盜駭散，岸上觀者皆以爲神。君爲人頎而哲，眉目秀朗，指爪纖長，斌斌然風流儒雅。已，好拳勇，衣短後衣，跨刀，腰弓矢，躍馬而馳，居然一邊外健丁也。趫捷有力，能踏壁直上，倒挂梁栱間，或騰身上屋，屋瓦無聲，展兩臂，使數人屈伸之不得，以爲樂。[67]

可見世道動亂，盜賊橫行，亦使英雄有用武之地，才士乃多致力於武，方氏兄弟出身官宦家庭，皆以舉業為本，卻也都用力習武，而其武術也真有不時之需，此殊非偶然，蓋時勢使然也。除此，前述與方以智共處於澤園中的少年好友周農父（歧），就是在外在情勢的推促下，步向習武之途——方以智在〈送周農父還故鄉序〉中說道：

> 予自束髮交農父，至文弱，當澤社咏歌，志必于儒者。目天下多事，起而談兵，今遂能披甲馳突，親當矢石，豈非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乎？農父口吃而善著書，自詩詞外，所條論當世之務，動數十萬言。流徙攘攘，惜遭焚失。頃酒酣，與人料成敗，輒如桴鼓。此繇觀古今熟，非但精陰陽占驗家學也。吾邑經民變寇警，益易練習，農父登陴以為常。家君子扞郢，周子實左右之，八戰而捷，每算必中，王佐才何必多古人耶！[68]

澤園三友中，方以智天性好博，因廣涉而及於武學，孫克咸則或因性格豪俠而兼通文武，然而，周農父卻文弱好儒，本來大概無意於武事，卻因外在情勢的影響，也談兵習武，終於也頗通戰鬥之技能，以至開發出兵法布署上的長才，而有豐碩的戰績。如此，方以智兄弟及其少年好友，都身懷武技，甚而武事造詣不凡。這應該就是前述時代趨勢下，談兵論劍風行的影響結果。然則，此種談兵風

---

[67] 錢澄之，《田間文集》卷二四，〈前處士方次公直之墓表〉，頁 466。
[68]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五，〈送周農父還故鄉序〉，頁 540。

尚下的習武卻未必能完全歸納於實學範疇中，反倒是與城市生活有其親近性，而傾具游藝趣味。

類如周農父這般由文轉武的事例殊非獨特，錢謙益在〈書寇徐記事後〉中亦嘗記：「子暇為舉子時，蒔花藝藥，焚香掃地，居則左琴右書，行則左絃右壺。一旦為廣文於徐，當兵荒洊臻，寇盜盤牙之日，挾弓刃，衣袴褶，授兵登陴，厲氣巡城，日不飽菽麥，夜不御筦簟，世間奇偉男子，磊落變化，何所不有。」[69] 這種在動亂時代下，儒雅文人轉為挾刃偉漢的事例，除個人之性格或機遇外，更可說是時勢使然。而且，此種文與武的轉換，甚至可說有其理所當然之處——陳繼儒在〈馮甄甫傳〉中載言：

> （甄甫）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嗄為？」……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為橫琴作雅操一弄。……君狀貌魁岸，廣顙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艸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劒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戰，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酒徒膝上老耶？[70]

馮甄甫顯然文人性格極強，他好古、好字畫、好山水、好飲酒，最後年方廿一即因縱酒亡身。他也可能愛好騎射，所以陳繼儒理所當然地認為他若生當滿州侵明之日，應該會散金結劍客，在武功上有所表現。這種理所當然的推論，多少反映出好文藝與好武事之間實有相通之處。事實上，明中期以來確實不乏此類文人——龔煒《巢林筆談》中記其外祖父道：

> 外王父莘伍葛公，長身玉立，善騎射，好讀史，愛客。酒酣以往，指畫山川形勝，評說古今成敗，及行軍用兵倚伏之勢，精彩葩流，聲情慷慨，往往傾其座人。嘗馳馬忠武祠前，皎日銀鞍，觀者如堵，外伯祖孺初先生作長歌記之。頗愛古玩，每歲於荷花盛時，約舉香爐會，有客石秀卿為之驛騎，金鏤銀塗，羅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71]

---

[69]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四，〈書寇徐記事後〉，頁 1776。

[70] 陳繼儒，《晚香堂小品》（收入江亞沙等編，《中國古代小品精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第 9 冊），卷一七，〈馮甄甫傳〉，頁 47-49。

[71] 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葛莘伍〉，頁 3-4。

在此可以看到談兵與騎射活動都相當具有表演性，尤其在觀者如堵下銀鞍馳馬忠武祠前，這與其說是戰技的演練，毋寧視為游藝的展現。或者可以說，這兩者之間實有相通之處。葛莘伍的酒酣談兵、馳馬示眾與品賞古玩，大抵可視為是相同性質的活動。而且，這除可說是葛莘伍個人好尚外，背後更有一種社會文化的底蘊存乎其間。方以智、孫克咸之所為，殆與馮甄甫、葛莘伍之表現，俱屬同類，都可視為此種文化的展現。

方以智等人之作為除反映時代動亂刺激士人「起而談兵」外，更顯示士人的武術活動實具多采豐富之意涵。方以智澤園三友習武固然有感於時代之動亂，但也和個人的慷慨狂俠意氣相關，而由此出發之武術活動，一方面有「實學」之面向，甚至有追求不世「武功」之意圖，實際上也曾具體落實保鄉衛國的行動，乃至為壯烈殉國；另一方面，其武術活動又有逸出於現實層面，甚至刻意抵觸現實。方以智與孫克咸的武術活動，更被放置在城市生活情境，乃至在妓院游樂活動中，如此活動顯示武術乃有超越「實學」的面向。方以智等人在城市中的武術活動，已不全然歸屬於實學脈絡，而多有文藝意趣，可以視為「文人文化」脈絡下的表現。

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方以智等人的任俠尚武並非只是某些特定個人的特殊愛好或作為，這毋寧說是種特定的社會文化。蓋此種行為表現，除了事此之士人內在心態為其動因外，此種風氣之形成與演化，乃有外在因素以相糾結合成，尤其是城市中社交生活的開展，更是其生成之主要場景。這種武術文化可以說是特定體制下的士人心態，加上政治情勢、社會條件與歷史成因，交相激盪，合成演化的結果。

（二）「武藝」：武術的雜藝屬性

黃宗羲之子黃百家曾隨內家拳高手王征南習武，當其武術略有所成之後，黃宗羲卻要他停止習武活動，棄武歸文，百家就此記道：

> 家大人見余跅弛放縱，恐遂流為年少狹邪之徒，將使為學科舉之文，而余見家勢飄零，當此之時，技即成而何所用？亦遂自悔其所為，因降心抑志，一意夫經生業。[72]

[72] 黃百家，〈內家拳法〉，張潮、楊復吉、沈楙惠等編纂，《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清道光世楷堂刊本影印），別集第 4 冊，頁 3196。

黃宗羲本身也講究兵法武術，且曾起兵抗清，有實際帶兵經驗，但在此他卻勸止其子繼續習武，這固然是因為動亂已過，清廷統治已穩固，略無用武之地。然而，除了時代性的考量外，所謂「見余跅弛放縱，恐遂流為年少狹邪之徒」這也顯示，武術的學習也是可能和個人性格相結合，而走上狹邪之路。這種說法正反映出武術在知識的屬性上有其逸樂的一面，而且可能和任俠的文化相結合。而事實上，這背後更有一種獨特的「武藝」、「武俠」文化蘊乎其中。

陸世儀等人之講究武術，大抵仍將武術歸屬於經世的範圍內，由其所展開之相關活動，主要乃是著落在追求現實之功能性目的下。然則，士人之學習武技在意圖上或實際施展上，都未必全然著落（或侷限）於現實層面，而具有保衛家國之實效。《明史・兵志》中即言：「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營官操練，又自執金鼓演四鎮卒。然大要以恣馳騁、供嬉戲，非實有也。」[73] 如果說明武宗對於武力的追求，全然出於游戲，毫無以武建功，求有實效之心，可能也言之太過。他的好武，應該不至毫無講究「武學」，建立「武功」的意味。不過，武宗的好武確實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游戲」意味。尤其是「豹房」的設立，在當時諸大臣眼中看來，更可直接視為逸樂遊戲之舉。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載及世宗遽逝於豹房後，楊廷和等人為防佞臣江彬起變肘腋，重新布署京城兵力，同時，「豹房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擊射生、櫂船黃頭郎、散樂工伎，一切罷遣。」[74] 顯見在事屬游戲性的豹房中，除有各種方伎雜藝者流外，也包含身懷武術者。這樣將武術與游藝雜然共處的安排，也反映出在明武宗的概念中，武術與方伎雜藝，實事屬同類。這也就是說武術的講求除了可以落實在經世之脈絡中，成就「武功」的追求，或者在實學範疇中，成為「武學」的講究外，它也可能成為一種游藝活動，而呈顯出「武藝」的面貌。以下且就此「武藝」進行討論，考察其如何著落在社會情境中，開展出相關的社會活動，以至發展成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

明武宗之好武被視如逸樂或游藝活動，這並非全然出於武宗個人之特立獨行，或群臣之刻意偏見。事實上，明後期士人之講求武術，除將之視為實學要項，強調文武合一外，亦多有將武術視為游藝項目者。王慎中 (1509-1599)〈聚樂堂記〉中有言：

>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璫珮交於几席觴俎之間，

[73] 張廷玉等，《明史》卷九二，〈志第六十八・兵四〉，頁 2259-2260。

[74]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四庫全書》第 452 冊），卷一，頁 426。

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訾其內。極意六博，叫梟盱盧，揶手交臂之頃，車馬乘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劍，砉然雷奮，渢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麄猛而近鬬也。」則發秘冢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聚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繢，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摸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75]

在此王慎中敘列各種游樂之事，而在其論述中「擊槊試劍」之武術演習，乃與歌舞、賭博及書畫古玩之鑑賞、詩歌文藝之唱和，同屬娛樂項目。這種論點的表述一方面是觀念上的認知，一方面是現實的觀察。王慎中生當明代中期，而嘉靖期間，也差不多是士人文藝活動開始展開之時，此處所言之種種娛樂活動，正是當時一般士人，尤其是有文藝傾向之文人，所汲汲從事、樂而不疲之事。因此，由論述殆可見士人乃多有以武術為樂者，是亦可見武術除用以作為「武功」之求，而具有經世功能外，它也具有娛樂的屬性，而與文藝、書畫之類藝能，有其相通同質之處，概屬游藝之類。事實上，在當時的技藝活動中，武術往往與諸多雜藝並列。汪道昆 (1525-1593) 為當時琵琶名家查八十作傳，其中言道：

查八十名鼐，……鼐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鼐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76]

由此敘列略可概見武術實多與蹴鞠、簫琴並列。查八十是一個商人出身，而好聲色游樂者，因此，此處所列之諸種技藝，也都可視如游樂項目。

王慎中之觀點並非獨創，而汪道昆的敘列也非偶然，事實上，這與當時一般士人對武術之知識屬性的認定有關。李維楨〈鄉祭酒吳翁墓誌銘〉中載：

翁名希名，字宗寶，……少有異質，啼聲覃訏載路。稍長，受書，善記，卜筮、星曆、醫藥、相地、相人諸方技家言，無不綜覽，談者莫能難，釣

[75] 王慎中，《遵巖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105 冊，據明隆慶五年邵廉刻本影印），卷二二，〈聚樂堂記〉，頁 846。

[76] 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八，〈查八十傳〉，頁 601。

獵騎射、五白六博、擊筑高歌，伏習者莫能勝也。[77]

這種表述方式大抵可見，在晚明習武風尚下，士人多有習武者，然則，一般在知識的歸類上，乃多將武術與各種雜藝，特別是帶有游樂性質的活動，相提並論。這也就是說，士人將武術納入其知識範圍內時，在其知識版圖中，武術乃多被置放於旁支性位置。關於此，除李維楨所述外，方以智在其自我表白性的文字〈七解〉中亦有言：

抱蜀子少倜儻有大志。年九歲能賦詩屬文；十二誦六經；長益博學，徧覽史傳。負笈從師，下帷山中。通陰陽象數、天官望氣之學，窮律呂之源，講兵法之要。意為古之學者，遇時以沛天下，而未之逮焉。性疎達，善得大意，而疆記為難，久之略忘，竊自恨甚，恨材知不及古人，而復身弱多也。又善臨池，取二王之法。好圍棋、舞劍，少知彈琴，吳歌、雜技之末，有所見，輒欲為之。[78]

這個「抱蜀子」應是方以智的化身，而由此自白可見，方以智也是個不甘於平凡的士人，他「意為古之學者，遇時以沛天下」，在此宏偉的人生想像下，他的知識範圍與才藝活動也遠遠超越科舉的要求，在其廣闊的知識世界中，兵法與武術，亦屬其中之要項。而由此敘述也透露出其各種知識藝能的分類範疇，在此分類下，兵法的講究乃與易術、天文、音律等並列，屬正統經史之外的「旁支」性知識，而武術則與琴、棋、書法等並列，乃屬藝術性技能。如此，兵法乃與其「博學」之追求相關聯，而武術則被視如藝術活動——或者可就此稱為「武藝」——這也暗示武藝的追求或展演，實有特殊的「浪漫」情懷蘊乎其中。

方以智在明亡之前頗具文人性格，而在文人追求博雅的知識版圖中，兵法、武術乃占有一席之地，此種知識版圖的伸展，乃與其浪漫情懷相呼應。他曾在〈咏懷〉詩中自道：

十歲好擊劍，舞衣動白日。醉後亂傷人，左右皆股栗。年年多讀書，浮氣忽已失。[79]

此種行徑與情懷正與其知識傾向相呼應，都相當具有文人化的意趣，而由此描述可見，其「好擊劍」實有一種年少浪漫的情懷鼓盪其中，這當中的游藝性質恐怕

---

[77]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七，〈鄉祭酒吳翁墓誌銘〉，頁 534。

[78]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三，〈七解丁丑答客作〉，頁 500。

[79] 方以智，《博依集》卷五，〈咏懷〉。轉引自任道斌編著，《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 40。

更盛於「經世」況味。在此他自言，年長多讀書後，「浮氣」已失，但事實上，他在南京期間，此種藉武力以展現浪漫情懷之作為更為張揚。據陳維崧言：

> 當是時，秣陵全盛……密之先生衣紈縠，飾騶騎，鳴笳疊吹，閒雅甚都。又以四郊多壘，尤來大槍之寇薄於樅陽者，歲輒以警告，以故先生益慷慨習兵事，堂下蓄怒馬，桀黠奴之帶刀劍自衛者，出入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80]

由此描述可見，方以智除了在知識藝能層面上講究武術外，他更將武力帶入生活中，而展現其豪俠之態勢。這種張揚的生活姿態，可說其談兵論劍行徑更進一步外向發展的表現。這可以說是任俠心態衍生為崇尚武術的行徑後，進一步將武力浪漫化，以至於在生活中張揚誇耀此種被浪漫化的武力。方以智之習武、耀武，與前述孫克咸之「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因以取號「武公」；以及方以智在為其作序時強調其能「左張弓右濡毫，盾上磨墨，下馬露布」；乃至兩人在妓院展現武藝以為游樂，都可視為是種「浪漫化」武力的表現，這都是將武力編織於「傳奇」人生的作為，或者，也可說這是試圖藉諸武力以實踐其傳奇人生之意圖。

方以智可說是明末之際士人群中特具活力者，蓋其家世顯貴，兼以個人天資優異，因此自命不凡，年少輕狂，而以武術宣洩其狂俠之氣。然則，此種心態與行徑不止是方以智個人，或其周遭友人為然，這與其說是一些特殊個人的個別行為，毋寧說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文化。汪道昆〈王仲房傳〉中載：

> 王仲房者，吾郡中俶儻人也，……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囤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囤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81]

王仲房是明代中期的知名文人，然而他在少年之時，卻在科舉與文藝之間擺盪，他母親對他期許甚高，希望他能在舉業上有所發展，仲房卻別有懷抱，不願生命困守於科考中，因此母子關係緊張，汪道昆另有〈王母高氏墓志銘〉，其中記道：

> 仲房稍長，治博士家言。業既通，則以為不足治也，每對案輒廢書嘆曰：「男兒負七尺軀，百年一瞬耳。我求古昔，上之為韓眾，為王喬，僊僊乎

[80] 陳維崧著，陳振鵬等點校，《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一，〈方田伯詩序〉，頁 21。

[81] 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八，〈王仲房傳〉，頁 606-607。

> 天行矣。次則為驃姚，為定遠，威行沙漠萬里外，不亦飛將軍乎。又次則應詔稱詩，為李供奉，被酒入大內，立奏若干言，據牀命力士奴隸之，蓋翩翩然佳士也。凡此何不可者，何至屈首敝吻，沾沾糟粕為哉！」日走馬出廬東門，從諸少年角射，下馬席周公瑾墓，酹酒和歌。母以為不羈，亟請次公遣歸就學，……仲房即在諸生，其稱詩常什九。又以其私召方士，求刀圭。既數困有司，母怏怏。癸卯又困，母恚而叱曰：「若薄舉子業，為名高，彼其與計偕者何業耶！曾何負若，若自託於李供奉，寧能待開元遇合時乎！……」[82]

王仲房可說是個相當不守「本分」的士人，他偏離士人經由科考以入仕的現實人生路徑，他充滿浪漫情懷，其人生「理想」乃在為神仙、為名將，或為詩人，在此浪漫之人生想像下，他召求方士秘方，從事詩文寫作，並「從諸少年角射」。凡此，概可視為其浪漫人生的追尋之道。所以，他的學習武術背後實是出於浪漫情懷的鼓動。其「具文武才」，詩藝與武術，同出一源，皆為不凡人生想像之寄託。也因此，他千里拜會文壇領袖李夢陽不遇後，乃轉至少林寺，跟隨武術名家扁囤學習武技。在其心中，詩與武俱是開發生命光輝之重要藝業。汪道昆在文中將李夢陽與扁囤相提並論，且交錯書寫，除顯示仲房之兼重文武外，這多少反映汪道昆自己也在觀念上認為兩者有類同之處，可並列於「藝」之範疇內。王仲房之兼具文武才，同時將文藝與武術作為生命的出路，這固然與其個人特質有關，而如他這般積極致力，且表現不凡者，也確實不多。然則，這並非特異，此中乃有明代士人之共同心理與文化，王仲房之所為殊非異類，而只是其中之出類拔萃者。

科舉制度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在四書五經字句與八股制式文章中反覆鑽研，因而多有生命受其羈限之無奈感，同時科舉競爭日益激烈，多數士人多有考試挫敗經驗，以致在現實中常有困頓之感。在此情境下，特具才氣與志氣，別有浪漫情懷之士人，往往不甘心人生全然綑綁於科舉體制中，而刻意對科考知識抱以不屑態度，轉而將其生命力投注於文藝或其他藝術，乃至諸多游樂活動中，藉以發舒其不平之氣，或作為昂揚生命力之寄託。在此之中，武術活動也往往存乎其間，且因時代危機，更讓此種技藝，特為突顯。方以智、王仲房之外，不乏他例——汪琬〈忘菴王先生傳〉中有載：

---

[82]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六，〈王母高氏墓志銘〉，頁 977。

>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踘、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藝花種樹、豢魚籠禽之方，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擅鑒賞。當王氏家門鼎盛，其先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摹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為徭賦所困，又性好施予，親故間或有負之者，亦槩置不問，計一歲所入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83]

這也是一個不屑困守舉業，自命不凡，且深具文人性格的士人。在此可以看到當士人的知識活動跨越了科舉的侷限，而旁及文藝後，乃將武術納入其藝能範圍中，且在此敘述中，更將「馬射、技擊」之類武術與「投壺、蹴踘、彈碁」並列，由此可見武術實多有歸諸雜藝之類者，而且，在此歸類下，武術已經和武功、武學的講求，頗見歧異。在此描述下，王武是個十足的文人，其「雅不事生產」顯示他的人生實已多所逸出於現實之外，此殆可謂乃藝術化的生命情調。也因此，其學習武術，實亦未能著落於現實層面，不得歸於「經世」範疇中，蓋其游樂性乃多於實用性，此種「武藝」可說已經和武功之追求相去甚遠，其性質殆已有別於具實學意涵之「武學」矣。

王武之「武藝」與孫奇逢之「武學」，殆可視為武術趨向之兩端。一則逸出於現實，一則投入於現實；一方多具游樂性質，一方多求刻苦事功；一在藝術範疇，一屬經世脈絡。不過，這種分別乃屬概念性的區分，實際上，一般士人之習武，不能斷然歸屬其一，而謂非此即彼。如方以智之學習武術，即不能說全然出於游樂，或說完全無關乎現實，如前所言，澤園三子事武之源起乃「目天下多事，起而談兵」，而且三人往後，也確曾投身軍事行動，乃至有以身相殉者。是故，不得謂其武術概屬「武藝」，而無「武功」之成分。如此，明後期士人之習武，乃多在武功與武藝兩端游移，或者兩者雜然並存，因應於現實情境，而有倚重倚輕之勢。錢謙益，〈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中載：

> 公諱國楨，字克生，湖廣麻城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奇節，一旦盡出公下。間拉宿將健兒，遨

[83] 汪琬，《堯峰文鈔》卷三五，〈忘菴王先生傳〉，頁 580。

> 戲近畿，貰酒呼盧，走馬角射，衩衣短袖，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84]

《明史》中稱梅國楨「少雄傑自喜，善騎射」，[85] 此處所述乃是梅國楨科舉受挫客居長安時之作為，據此看來，國楨此時乃多任俠行徑，而此際其武術乃成游樂之技藝，殆可以「武藝」視之。然則，國楨中舉後，官職多涉軍事，曾監軍寧夏，頗有討賊之功，其後更巡撫大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蓋中舉任官後，其武術則多能用於經世之途，而多建「武功」。由梅國楨之事例可見，在具體個人身上，「武功」與「武藝」未必絕然二分。不過，話再說回來，梅國楨性格上實深具文人性，若非他別有機緣得以武建功，則其武術極可能只在「武藝」面向上顯現，而以城市游俠終了一生。也就是說，他的武術實兼具「武功」與「武藝」兩個面向。一則如正史之所載，導向現實，成就「武功」；另一方面，則如此處所記，著落在城市之交游活動中，而以「武俠」之姿態顯現。

事實上，此種「武藝」與「武俠」的表現，乃明後期文人之常見形態。以下且對此「武藝」之「武俠」的面向，更加發明。

四・武俠文化的形成

如上所述，武術有「武功」、「武學」與「武藝」等不同面向：「武功」深具現實性，意圖著落在現實世界中，以武術救濟，甚至改造現實；「武學」則顯示兵學與武術之知識意涵，可以納於「實學」脈絡中，加以考究並求其實踐；「武藝」則極富傳奇性，意圖逸脫於現實世界之外，以武宣洩、展現豪氣，藉武以事游樂，以相交游。如此，武藝之講求，乃深蘊浪漫情調，可以觸發文人的激情，而成為文人文化的一個特殊面貌。此外，武藝之浪漫性又與晚明士人之任俠心態相激盪，而談兵論劍之行徑，又得與城市社交活動相結合，由此演化成一種別具趣味的「武俠」文化。

(一)「武俠」人生

明中期談兵論劍風氣越演越烈，這種尚武之風激發士人的豪氣，此又與當時

---

[84]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四，〈神道碑銘三・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頁 1502-1503。

[85]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二八，〈列傳第一百十六・梅國楨〉，頁 5979。

士人的俠游之風相激盪、合流，以致部分士人將其生命熱情，投注於武事之議論與追求上，由此激射出昂揚的生命熱力。陳子龍〈宋幼清先生傳〉中載：

> 先生幼孤，生十三年而能文章，喜交遊。稍習經生家言，即棄去，顧好為俠。慕戰國烈士之風，祠趙相、虞卿於家，所以見志也。私習古兵法，散家結客，欲以建不世功；而會是時海內承平，無所自見，則游於酒人，任誕；嘗與客飲中野，取髑髏行酒，已則相與刺臂血，瀝而埋之，對泣也，復歌呼而還。[86]

宋懋澄好為俠、好談兵，兩者交相激盪，形成極為激越的生命情調，陳子龍與之相熟，此處所述，自有動人之處。吳偉業為其所撰之墓誌銘中有言：「公爲人落拓有壯節，好奇計，足跡遍天下，散財結客，嘗欲一旦赴國家之急以就功名。……又負奇略，規摹九邊形勢，親歷險塞，與其賢豪長者游。」[87] 可見以武建功，乃其人生想像。其俠情與武事交相作用，他將俠的生命意態傾注於武事經營中，意圖以武自顯，以發落其俠情。只是，他生不逢時，懷才不遇，處身萬曆後期，短期內無用武之地，以致終身壯志未酬，俠情空轉，最後遺憾以歿。然則，由宋懋澄之所為，亦可具體觀見一種「武俠」式的生命情調，而此種生命情調，除可視為個人特質外，亦可謂乃時勢使然，且其中有值得探究的社會文化意涵。

在談兵論劍風氣下，士人多有以通武自豪，且時而以武會友，意氣風發，相互激揚豪氣。張佳胤〈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嵩陽劉公暨配胡孺人墓誌銘〉中敘及劉繪入京考試之事時寫道：

> 先生長皙，電目高準修髯，喜讀左、國縱橫家言，擊劒通俠以自豪。嘉靖辛卯，領省解入京，而滏陽王生引少年數十輩，逆先生邯鄲，校獵山下，置酒亢歌振木，燕、趙慷慨之士聞之，咸為感奮。[88]

《明史》稱劉繪：「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89] 或許，他「鄉試第一」的頭銜已經引人注目。然而，「少年數十

---

[86] 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8 冊，據明末刻本影印），卷一三，〈宋幼清先生傳〉，頁 117。

[87]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6 冊，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影印），卷四七，〈宋幼清墓誌銘〉，頁 263。

[88] 張佳胤，〈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嵩陽劉公暨配胡孺人墓誌銘〉，黃宗羲編，《明文海》（收入《四庫全書》第 1458 冊），卷四三六，頁 293。

[89]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〇八，〈列傳第九十六・劉繪 子黃裳〉，頁 5507。

輩」相迎，共相馳馬校獵，縱酒高歌，此則可說是尚武風氣下，其「擊劍通俠」乃足吸引「慷慨之士」同氣相求，以致有此以武會友之熱烈場面。由此令人感奮之場面，亦不難想見當時京城於尚武風氣下，諸多士人藉武昂揚意氣之盛況。事實上，由前引錢謙益有關天啟年間士大夫與各階層相率談兵的描述，已略可概見，談兵論劍之行徑實帶有相當的浪漫情懷。其所謂「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矢口奮臂，獵獵然風生燄發」顯示出參與者意氣風發、壯懷激烈之情緒與神態，而在此種情緒之鼓動下，由所謂「逝將繩度黑山，弓彎綠水」，不難想見此場合中，熱烈的氣氛下，高昂的情緒所激發出來的各種美麗壯烈的想像。這種想像想必能造就參與者強烈的感動，因而激盪起個人的生命熱力，從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如此，談兵成了一種激發生命想像與動力的一種觸媒，點燃生命的光亮。而由「購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之說，則可以推測此種談兵事，事實上也不盡然侷限於現實層面，在一般之軍事範圍內討論如何增強武力，以保衛國家安全；此中尚多有士人好奇之心，鼓盪其間，這與其說是現實性的追求武力，不如說是藉武力之講求，而激發出超越於現實的想像。

由前引茅元儀對當時談兵者多虛誇不實的批評，亦可窺見當時在此尚武風潮下，武術的講究可能超越其原本所具有之功能性，而更發展成特殊的社交活動。李維楨在隆慶、萬曆年間任職翰林，在京期間，與各方文人多所交往，親身參與諸多社交活動，對當時京城之社交氛圍有直接感受，他在〈瀟湘編序〉中言：「不佞往官輦下，山人四方雲集，大都喜慕俠烈風，身處布衣之位，而慷慨抵掌談當世事。」[90] 可見當時「慕俠」成風，多慷慨談世事。然則，此種慕俠風尚下之社交實況又是如何呢？他為俞羨長之詩集所作序中有謂：「（羨長）所游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劍，恢然有用世大略，所至王公大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鬬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生人之樂，抵掌評隲，四座皆傾。」[91] 綜合來看，談兵論劍活動乃多與城市游樂生活相結合，抵掌論世事，論劍慕俠風，相互激盪，而諸多山人者流，乃更縱游其中，如俞羨長者流，乃將「談兵說劍」與「鬬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同舉並行，甚而融為一體，在聲色犬馬中談兵說劍。如此，則武藝更與俠游合而為一，形成一種別具意蘊的「武俠」文化。

---

[90]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二二，〈瀟湘編序〉，頁 781。

[91]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一二，〈俞羨長集序〉，頁 566。

進一步體察前述相關記述之實況，可以看到武學性質的異變：原本出於保家衛國意圖的武力追求，更與年輕人的任俠心態相結合，而演變成以武會友的交游活動，且由此發展出張揚武力的誇耀行動。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武力的追求、講究已經不止是一種單純的社會活動而已，它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相從談武事，已經不只是在現實層面上追求武力的增強或組織的強化，它更成為一種交游活動的媒介，以至由此發展出繁複、龐雜的交游活動。同時，武力也已經成為一種象徵，武力不只是一種可以發揮實際效用（如保衛鄉土）的力量，而是它本身即為一種姿態或表徵，它成為一種可以誇耀的文化意象。我們可以說在此武學已經被放在社交場域中，成為一種用以相互交結、自我誇耀的工具。如此，武術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得以用來作為某種特質、意態或身分的表徵。

回到明後期文人的生活世界來觀察可以發現，「武藝」常常出現在文人的生活情境中，成為一種別具意趣的性格表現。李維楨〈方外史墓志銘〉中另有言：

> 建元幼而穎悟，物至能名，好讀屈宋騷賦漢魏六朝李唐諸詩，而又好游，西入楚蜀，至夜郎；北入齊魯燕趙，至蘇門盧龍。諸塞上感事弔古，形之篇咏。諸名士延入社中，據左席，浮白長嘯，醉或累日夕鼾臥，忽寤而伸紙揮毫，多奇語，人益異之。又好從少年，短衣楚製，馳馬試劍，牽黃臂蒼，捕生纍纍而返；或過青樓，自度曲被歌聲，五木六博諸戲錯舉遞奏；又好救人戹，振人不贍，所席父遺貲揮斥殆盡。亦會有病，遂歸，而婦已產子，持門若丈夫，一切家政聽之，不復孰何，第研精于詩。汪先生為豐干社，能詩者推遜建元。[92]

這是很典型的文人生活的描述，方建元的好文藝、好游、好酒、好詩、好妓、好賭、好揮霍、好賑人、不事生產……等等，凡此皆文人「俠游生活」的重要表徵，[93] 這種種行徑，正顯示出一種充滿浪漫情懷，刻意逸脫於現實世界，而充滿傳奇性的生活情調。而在此諸種生活表現中，特有關於武藝方面的描述，所謂「好從少年，短衣楚製，馳馬試劍，牽黃臂蒼」更具體地顯示傳主的任俠行徑，這種表述一方面是傳主事實的描寫，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刻意強調。如此，武藝成

[92]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七，〈方外史墓志銘〉，頁 530。

[93] 關於文人之俠游生活，可參王鴻泰，〈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 101-147。

為一種逸樂性的作為，也因而成為文人用以表達自我，展現豪俠性格，開展另類人生的憑藉。

關於這類以從事武藝活動以激發個人豪情，藉武藝以展現個人任俠性格，而以武俠姿態現身的文人，實不乏其例。王穉登在〈廣長菴主生壙志〉中自述道：

> 先府君用賈起家，德最盛，迨余始受儒，……少好弄，善升木乘屋，探鳥彀，放風箏，捕蟬彈雀，鬬雞蹋鞠，聚群兒學擊刺，先府君屢撻之不止。……乃余四齡能占對，五齡誦詩，六七齡為擘窠書，九齡能賦五七言，以不令受儒，故九齡猶讀小學。……初舉武進諸生，不喜博士家言，期以竹素目見。……未幾，北游燕都，入太學。縱觀皇帝宮闕之美，車書禮樂衣冠之盛，一一托之詞賦。……薦直史館，校《永樂大典》，名一日滿都下，戶外車轍旁午。余意不樂，顧樂與酒人詞客走馬章臺下。燕風日靡，無古昔慷慨悲歌之氣，去覔賣漿擊筑，其人不一遇，意鞅鞅。……平生好奇畫，喜談劍術，負氣不下，懷千古之慨，釋紛死黨，屢陷虎口不為悔，少尤好肉孌童季女，不去左右，獨不善麵生與阿堵。……余少好儒，中好俠，晚乃好墨。其儒也，儒者得名之俠也；俠者，得名之墨也；墨者，得名之若夫。非儒非俠非墨，此誠故吾，吾不能自名，還詢造化而已。[94]

此文乃王穉登對自己一生的縱觀回顧。王穉登名列《明史・文苑傳》，其中言：「吳中自文徵明後，風雅無定屬。穉登嘗及徵明門，遙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嘉、隆、萬曆間，布衣、山人以詩名者十數，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輩尤為世所稱，然聲華烜赫，穉登為最。」[95] 是可見穉登乃明後期最重要的文人之一，其生命歷程與所好所為，在相當程度上，殆可視為文人生活與文化的典型與表徵。而由此描述可見，武藝乃王氏生命中頗為重要的成分，這一方面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寄託，也可以說是他某種生命情調的表徵，自幼年「鬬雞蹋鞠，聚群兒學擊刺」，以至年長後「喜談劍術，負氣不下」，甚至「去覔賣漿擊筑」，這些都可視為「武俠」心態與行為的表現。由此表述明顯可見，穉登之一生乃深具「俠」之情調，而此種「俠」情乃具體化於武藝的講求中。事實上，穉登自己也以

---

[94] 王穉登，《王百穀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5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廣長菴主生壙志〉，頁 267-269。

[95]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列傳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頁 7389。

「俠」自許，在此自我表述的文字中，刻意以俠來作個人生命的基調，有以俠來貫通、總結自己一生的意味。而他的「武俠」人生，包含幾個要素：「鬬雞蹋鞠」、「不喜博士家言」、「學擊刺喜談劍術」、「慷慨悲歌之氣」、「走馬章臺」、「釋紛死黨」……等等。要之，這是一種自命不凡、抵制科舉、講求武術、愛好文藝、縱情游樂、義氣相高的人生。這些內涵大抵可視為明後期文人所建構出之「武俠式」生命樣態的基本內容。

王穉登之行徑與表述可視為「武俠」人生的代表，這種「武俠」式的生命情調，實為明後期文人之重要特色，前述方以智、孫克咸、王仲房、王武諸人概屬此類。除此之外，我們不難在諸多事例中見到此類講求「武藝」，遂行「武俠」人生之文人。王穉登為張應文《清秘藏》一書作序時，即謂：

> 先生少任俠，好擊劒，務奇畫，屠狗賣漿之夫，庶幾一遇。……弱冠，始有用世志，于是下帷受經，墳典邱索，靡不悉究，以弟子員遊太學，太學諸生無能出其上，意一第如拾掇乎，而竟屢試屢不售，先生怫然曰：「吾不可以此久溷迺公也，人生亦安得俟河之清耶？彼漆園吏何人？斯顧吾且不得為郊祀之犧牲乎？」棄去公車絕不為。[96]

又如，汪道昆〈卓澂甫傳〉中載：

> 澂甫幼負俶儻，呫呫喜為名高：「男兒生當提十萬師，橫行塞外，焚老上封狼居胥以還，徒敝唇吻，誦老生陳言，非夫也。」於是陽從外傅請業，退以其私習技擊，學縱橫家。[97]

再者，錢謙益〈汪君六十序〉中亦載：

> 嘉定程孟陽嘗為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嶄然有志於功名。偕年少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騰肉飛，如饑鷹餓鴟。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隔世。[98]

以上所舉都是明後期頗具聲名的文人，由這些描述亦可見，這些人都曾胸懷大志，不甘心生命活動被壓縮於科舉體制下，因而試藉諸武藝的講求，以抗拒、突破庸俗現實的侷限。固然，這些人亦有藉武術以追求武功之壯志，但他們終究沒有機會付諸實踐，最後他們都以文人終。所以，他們的武術不得成就「武功」，

---

[96] 王穉登，〈清秘藏序〉，張應文，《清秘藏》（收入《四庫全書》第 872 冊），頁 2。
[97]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六，〈卓澂甫傳〉，頁 782。
[98]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七，〈汪君六十序〉，頁 1032。

而轉成「武藝」，成為高亢其生命情調的憑藉，此種藉武藝以任俠者，概可歸類為「武俠」類型之士人。

由於講究武藝已成文人常見的行為模式，而且此類武俠型文人已經成為一具有代表性的士人形象，所以在小說中也已可見及此種行為模式與人物類型。例如：《型世言》卷二〇〈不亂坐懷終友託　力培正直抗權奸〉即曾在無意間述道：「秦鳳儀想起一個朋友，姓石名可礪，字不磷，便要去訪他。不知道石不磷也是嘉魚人，做人高華倜儻，有膽氣，多至誠，與人然諾不侵。少年也弄八股頭做文字，累舉不第，道：『大丈夫怎麼隨這幾箇銅臭小兒，今日拜門生，明日討薦書，博這虛名！』就撇了書，做些古文、詩歌、彈琴、擊劍，寫字，畫畫，……只因他有才，又有俠氣，縉紳都與他相交。」[99] 又如，《醒世恒言》卷二九〈盧太學詩酒傲王侯〉故事中載道：「盧柟只因才高學廣，以為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福不齊，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上幾次，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100] 這些「武俠」人物類型與行為模式的出現，乃至於普遍化，正反映武藝已經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文化。或者，可以說「武藝」已經成為文人文化的一個環節，因此在文人之中，乃多可見及此種「武俠」型文人之行踪。

（二）武俠文化與異類交往

這類武俠型士人多自命不凡，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受制於科舉考試，這種受限的生命形態又激起他們的反彈，這種反彈的情緒，乃從武藝中找到出口，武藝成為他們寄託不凡生命的憑藉，成為他們創造或想像「傳奇人生」的羽翼。這種寄託在武藝上的人生志向，一開始就帶有幾許不切實際的浪漫色彩，而這也不易在現實世界中落實，真正以武立功。最後，他們就在社交活動「實踐」此種浪漫情懷，就此展開繁複的異類交游活動，藉由與各種奇才異能之士的交往來建構此傳奇世界。侯方域為至交賈開宗之兵書寫序時言道：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

[99] 陸人龍編著，陳慶浩校點，《型世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二〇，〈不亂坐懷終友託　力培正直抗權奸〉，頁 330。

[100] 馮夢龍編，《醒世恒言》（臺北：鼎文出版社，1978），卷二九，〈盧太學詩酒傲王侯〉，頁 597。

許得為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為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101]

同時，他又私下形容其生活：

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為之者，莫不為之。吾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雲馬矢之菜煅之可為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胤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人之為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102]

賈開宗的心態、作為與前述文人之「從諸少年角射」、「屠狗賣漿之夫，庶幾一遇」，或是「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可說實是同源同歸。這都是不甘心人生受限於現實層面，尤其是科舉體制的壓制，因而以高亢、誇張，甚至猖狂的意態，刻意踐踏世俗規範，更去追求一個「奇」的世界，而為了具體化這個奇的世界，乃在知識活動上開拓出一個博雜的知識、藝能的世界，也由此發展出一個充滿奇才異士的交往圈。如此，賈開宗的「負奇」、「好大言」，與其「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的知識活動，及家中多致異人，「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實是同一心態的體現，而這也是一套獨特的社會文化。

賈開宗的行徑除與其個性相關外，更可以說是社會文化使然，相類於此者，實不乏其例。王世貞〈李母顏孺人墓誌銘〉中言：

李母者，故鄉貢進士崑山李君希直之貳，……君任俠，能致千里外客，客至無論星相、風角、劍客、九九弄丸之伎，坐恒數十人，……君性跅弛，不復辨家人產，及歲入幾何，顧好施予，見義必達，……君好為山水遊，或過友，生夜分歸，……時君之產半割而費愈甚，母委曲應之。[103]

或如，黃淳耀在〈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中載：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

[101] 何法周主編，王樹林校箋，《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八陣圖序〉，頁 58。

[102] 何法周，《侯方域集校箋》，〈再與賈三兄肉食書〉，頁 143-144。

[103]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一四，〈李母顏孺人墓誌銘〉，頁 605-606。

客、彈棊、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104]

這都顯示士人在任俠、好奇的心態下可能多與異類交往，結交各種奇才異能之士，展開極為廣闊、龐雜的交游活動。除了在城市中接納各方擁有技藝者外，更有刻意行走江湖以求友奇人者。《郎潛紀聞》中載：

常熟郭孝廉大臨，任俠尚氣。桑海之交，竄身黃冠，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太沖先生讀書雙瀑寺，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大臨忽走訪，太沖問何以知之，笑不答。[105]

可見在任俠好武的心態下，士人乃可能積極展開其好奇之游，刻意去結交各種異類朋友。藉由這樣的交游活動建構出一個充滿傳奇性的人生舞台，從中展開精采豐富、慷慨激烈的生命活動。類似李希直與陳靖甫那般廣交善納的社交生活，其實需要具備相當的財力才有可能，而如郭大臨之所為更屬較為突出之舉。不過，這些並不全然是特例，而可視為某種共同「時代精神」的凸顯表現，這是一種社會文化下特別精采的演出，一般文人容或未能全然傚此，但亦心嚮往之，認同此種行徑，且或淺或深地具此傾向。這是一套能得到一般文人認同，而別具社會文化史意義的「武俠」文化，屬文人文化的一環。

查繼佐在清初享有盛名，因此莊廷鑨私刻《明史》，將之列名其中，以致捲入文字獄。盛名之下，他的生活實可視為體現武俠文化的有趣事例。他「少頗事釣弋兼以博弈。丁卯，延師肄技擊，獨善運槊，小弓洞徹，走馬最便。」[106] 丁卯年他二十七歲，年譜對此記道：「以魏璫驕橫行，且亂世必多故，與門人技擊。」[107] 這顯示時代的危機是觸動查氏學習武術的契機，而同時，這也和他的喜好雜藝有關，且這些雜藝之好又開展出龐雜的交往關係：年譜言其「好尚頗雜，凡殊能絕技之士，無不游于先生之門。武林有鄭方叔者，精琴學，與先生交最善。……又有杜生，六合人也，俗號水棊杜，亦以水棊自名，與人對局，不願求勝，而立論多奇詭，先生時與之弈，以善敗為喜，久之，人不識也，先生分館穀

---

[104] 黃淳耀，《陶菴全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297 冊），卷二，〈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代〉，頁 645。

[105] 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抄本點校），卷五，〈郭大臨〉，頁 103。

[106]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收入葉紹袁等編，《年譜十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據吳興劉氏嘉業堂栞影印），「丁卯」條補，頁 6。

[107]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丁卯」條，頁 6。

以養之。……若王樂水之評話，江濟寰之星學，趙君融之篆籀，盛符先之術數，沈似蘿之度曲，約二十餘人。」[108] 查氏在三十幾歲時，教學有成，弟子滿門，生活優渥，年譜曾記道：「戊寅 (1638)，先生三十八歲。先生下帷南屏，與同學開講席，或技擊較射，繼以絲竹。有處子字雪兒，年十四，家西冷，善歌舞稱絕，願為先生校書，因留絳帳中！於是有東山女樂。」[109] 於此可見其武術與聲色乃同時並舉，共同營構出一個極具情趣的生活。年譜最後編者——查氏門人沈起——評論道：「時海內各以意測先生，先生亦隨其意付之。有與講席明理學之宗者，謂先生務道；與共安危之間者，謂先生知兵；與解吐納之功，謂善養生；與奮塵縱橫、四坐折聽，謂好辨難；與肄弓馬、攻五兵之用，謂精騎射；與陸博、蹴踘及書畫、管弦等事，謂善游藝；與緩急人、約之以輕身，謂任俠……亦有以聲色言先生者。」[110] 查氏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武俠生活」的表徵。或者可以說，他處身於尚武與任俠風氣盛行，且武與藝交雜相融，而演成一套武俠文化的時代，在此文化的浸潤下，他也由此發展成一種深具武俠趣味的生活，以致成為他別具特色的生命情調與人生景象。

這種武俠人生的出現與風行，一方面有其現實背景為其肇端，社會的動盪，科舉的桎梏，城市社交的發達，俱屬成因。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出於士人的文化建構，蓋在習武風尚下，士人由此展開相關之社交活動，因而推促激盪乃成此文化形態。

明王朝的國家危機激起習武的風尚，這種習武風尚除了著落在現實層面，在經世脈絡中，發揮保家衛國之實效，建立武功，或發展成「實學」外。武術也可著落在城市生活中，以「武藝」的形態，成為游樂的項目，以至成為士人對抗科舉體制，另構人生想像的特殊憑藉，士人藉此以自我激勵，營造高亢不凡的生命姿態。如此武藝乃與任俠心態相結合，發展出「武俠」式的生命情調與活動方式，且由此展開精采的異類交往，進而發展出一套武俠文化。如此，武術的追求是一種社會活動的展開，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發展的過程。而這樣的發展有其嚴肅的學術面向，也有其精采的文化面向。

---

[108]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崇禎元年，戊辰」條，頁 6-7。
[109]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戊寅」條，頁 14。
[110]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丙辰」條，頁 49。

結語

明王朝在帝國日暮時分，猶然黨爭不已，東林黨與閹黨相互攻伐，此勢不兩立之情勢，不止於政治場合，也擴及於社會層面，不具官員身分的熱血士人也捲入其中。崇禎八年，閹黨餘孽阮大鋮避居南京，積極社交，圖謀翻身機會，因此引起復社諸子側目，最後公布「留都防亂公揭」，破敗其圖謀。關於此錢澄之記道：「會流寇逼皖，大鋮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遊俠，希以邊才起用。白門流寓諸生，多為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鋮。大鋮懼，乃閉門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111] 如是可見，其時談兵已成重要之社交名目與晉身之階。事實上，復社諸子亦多好談兵，故可謂，晚明之黨爭，乃具體垂現於談兵活動中，正邪雙方於其間互別苗頭，彼此競爭，而大明王朝乃在士人熱血談兵的高亢聲調中，由衰亂走向敗亡。

明中期以來，王朝軍事危機日趨嚴重，在此情勢下，自士大夫、縉紳、一般士人，以至於各方閒雜人等，都投入談兵論劍的行列，由此展開兵法、武術的講求。本文除勾勒此種習武風尚的流變外，主旨乃在分析此種習武風尚下，士人如何運用、看待武術，以及此種武術發展如何在社會層面開展出相關的社會活動，尤其是社交活動，並衍生出什麼樣的社會文化。

綜合上述討論，粗略而言可謂，明中期以來有關兵法武術的講求，大體有兩種屬性與趨向：一則歸於現實層面，屬經世脈絡下，具有實用性的「武學」，藉此以在現實社會中建立「武功」；一則逸脫於現實，屬雜藝技術之類，具有逸樂性的「武藝」，文人藉此以營造一超越現實「武俠」世界。在明代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武術文化同時發展，而有不同取向：「武功」屬性與明末清初之實學相合流，屬其中之重要內容，而有「武學」之講究，以至出現以此為重要特色之顏李學派。「武藝」屬性則與文人文化合流，屬其中獨具特色之一環，而有「武俠」類型士人之出現，此類人物活躍於晚明社會，以至成為別具特色之社會文化景象。當然，這樣的分梳，毋寧是概念性的區別，這可說是為了理解與討論的方便，所作的策略性的標記，不應過於執著，將之絕對化，視為界限分明的知識範疇。在現實社會中，個別士人極可能兼而有之，或者穿梭其間，或者倚重倚輕。要之，本文的討論重點不在為之建立知識範疇，而是揭示其豐富意涵，理

[111] 錢澄之著，諸偉奇等輯校，《錢澄之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卷六，〈所知錄・阮大鋮本末小紀〉，頁 151。

解其多元面向，並由此測知此種社會風尚之激盪下，相關心態與知識開展的歧異性及流動性。

康熙年間，天下承平已久，略無用武之地，江南地區一個在科舉場上屢經挫敗的生員夏敬渠 (1705-1787) 寫作一部長篇小說《野叟曝言》，這部小說創造出一個文武合一，且在武功上有極高成就的士人——文素臣——作者對之形容道：「且說文素臣這人，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卻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歷數，下視一行；間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112] 這是個極有趣的人物造型（這個人物後來成為黃海岱《雲州大儒俠》主角史艷文的原型），將此人物類型置於社會文化史脈絡中來理解，可以說是明中期以來習武風尚發展下的一項成果或變種。明中期以來在談兵論劍的風氣下，試圖憑藉兵法、武術來開展人生前途，建立不世之現實功業，成就非凡之生命價值，成為一種流行的人生想像。文素臣這個角色的塑造，及武功蓋世的一生經歷，可以說就是這種想像的具象化。這個人物與這部小說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明中期以來武學文化衍生出來的成果（文素臣所為多少可窺見王陽明之身影）。另一方面，這部小說的作者夏敬渠及書中主角文素臣，都是落第秀才，如此，這背後又有士人的科舉挫折為其心理背景，由此人物之創造，及其背後文化之發展，亦略可概見社會心理、社會文化發展之辯證關係。

要之，明後期士人在動亂時代的刺激下，自士大夫階層以至於士人，自中央官僚，以至於地方士紳，都被捲入追求武力的風潮之中。在此風潮下，武力之講求有其現實性，但卻又有非現實性的發展。因此除了藉武學之講究以保鄉衛國，或建立功業外；亦多有士人藉諸武藝以張揚個人不凡志向，建構超越現實的人生想像，或者，藉武藝以展開異類交游，在城市中展開俠游活動。如此，晚明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形成一種獨特的武學／武藝文化，此種武學（藝）文化的發展，一方面是時代趨勢的反映，一方面也是社會生活與文化發展、演化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的探究，一則可以探知明代社會脈動，理解時代下的心態，同時，藉此亦可對明清社會文化的內在意涵與演進脈絡有更深刻的掌握。

---

[112] 夏敬渠，《野叟曝言》（長春：長春出版社，1993），頁 2。

大體而言，本文的討論仍偏重於探究習武風尚之如何形成與表現形式，可說是有關武俠文化研究的「外篇」。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作知識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文學史的討論，諸如：實學思想的緣起與演變，尤其兵學知識與武備文化乃至於武術技藝的發展，有關武俠文藝書寫的風格表現與內在意涵，都可以在此社會文化的大脈絡下，作更深刻的思辯。

（本文於民國一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收稿；一〇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四部稿・續稿》二百七卷，收入《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1279-1284 冊。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四庫全書》第 452 冊。

王源，《居業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418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讀雪山房刻本影印。

王慎中，《遵巖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105 冊，據明隆慶五年邵廉刻本影印。

王穉登，《王百穀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 175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方文，《嵞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1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影印。

方以智，《浮山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3 冊，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影印。

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影印。

申時行，《賜閑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集部別集類第 134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江殷道等修，張秉鉉等纂，康熙《九江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華中地方第 736 號，據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影印。

任道斌編著，《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6 冊，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影印。

吳啟豐，《查東山年譜》，收入葉紹袁等編，《年譜十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據吳興劉氏嘉業堂栞影印。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
何法周主編，王樹林校箋，《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152 冊，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影印。
汪琬，《堯峰文鈔》，收入《四庫全書》第 1315 冊。
汪道昆著，胡益民等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周玄暐，《涇林續記》，收入王雲五主編，《涵芬樓秘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第 6 冊。
和珅等奉敕著，《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四庫全書》第 475 冊。
侯一麐，《龍門集》，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北京：商務印書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 35 冊，據明隆慶本影印。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茅元儀，《暇老齋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33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光緒李文田家抄本影印。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四十一輯第 409 冊，據清宣統三年刊本影印。
孫奇逢著，朱茂漢點校，《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夏敬渠，《野叟曝言》，長春：長春出版社，1993。
唐甄，《潛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95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達刻本影印。
耿橘，《常熟水利全書》，萬曆抄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張潮、楊復吉、沈楙悳等編纂，《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清道光世楷堂刊本影印。
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6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刻本影印。
張應文，《清秘藏》，收入《四庫全書》第 872 冊。
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8 冊，據明末刻本影印。
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抄本點校。

陳鼎，《留溪外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 122 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影印。
陳維崧著，陳振鵬等點校，《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陳與郊，《隅園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 160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至天啟元年賜緋堂刻本影印。
陳繼儒，《晚香堂小品》，收入江亞沙等編，《中國古代小品精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第 9 冊。
陸人龍編著，陳慶浩校點，《型世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8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唐受祺刻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影印。
屠隆，《娑羅館清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百齋刻本影印。
戚繼光著，盛冬鈴點校，《紀效新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湯斌，《湯子遺書》，收入《四庫全書》第 1312 冊。
馮夢龍編，《醒世恒言》，臺北：鼎文出版社，1978。
黃宗羲編，《明文海》，收入《四庫全書》第 1453-1458 冊。
黃淳耀，《陶菴全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297 冊。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董其昌，《容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2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影印。
褚人獲，《堅瓠辛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收入《四庫全書》第 507-512 冊。
趙爾巽等編纂，《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
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錢澄之著，諸偉奇等輯校，《錢澄之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6。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收入氏著，錢曾箋註，錢仲聯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羅洪先，《羅洪先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顧炎武，《亭林詩文集》，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正編，第 77 冊，據上海涵芬樓藏誦芬樓刊本影印。
顧璘，《顧華玉集》，收入《四庫全書》第 1263 冊。
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二・近人論著

王鴻泰

2005　〈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101-147。

陳登原

1989　《顏習齋哲學思想述》，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趙園

2006　《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濱島敦俊

1980　〈業食佃力考〉，《東洋史研究》39.1：118-155；中譯收入李范文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 2 冊，頁 123-163。

Martial Arts Achievement (*wugong*), Study (*wuxue*), Skills (*wuyi*), and Practitioners (*wuxia*): Trends in Practicing Martial Arts and Interactions beyond their Social Strata among Literati during the Ming Period

Hung-tai W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tarting in the mid-Ming period of tumultuous state affairs, Chinese literati who were concerned about issues of the state launched activities related to warfare debat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is topic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mentalities and history of culture (particularly knowledge). The social atmosphere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se activities took place are the first to be examined,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such activities. Secondly, by looking into the world of Chinese literati, the mentalities behind practicing martial arts are to be discussed, namely the realistic intentions, emotional investment and life aspirations behind these activities. Lastly, loo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examines where literati got the interest and knowledge to learn martial arts from and discusses how they place warfare and martial art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particularly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developed and the perception towards this knowledge (or skill).

Keywords: warfare debate, martial arts achievement (*wugong*), martial arts study (*wuxue*), martial arts skills (*wuyi*), martial arts practitioners (*wuxia*)